

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词条选译（三）^{*}

“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翻译工程”

项目组 译

阿高诸语言（Агавские языки, Агау языки）

（作者：Т. Л. 维朵施吉娜 [Т. Л. Ветошкина]；译者：徐来娣，南京大学）

构成库施特诸语言中部语支的一组语言，通行于埃塞俄比亚北部和西北部，使用人口38万。属于阿高诸语言的有：奥恩吉语（阿维亚语），通行于戈贾姆省南部；比林语（博戈语），通行于厄立特里亚；汉坦加语（汉塔语）和已经消亡的哈米尔语，通行于蒂格雷（提格雷）省和沃洛省的交界处；克曼特语，以及已经消亡的夸拉语和登贝阿语（凯洛语），通行于贡德尔省。在闪族人从南阿拉伯迁移到非洲之前（不迟于公元前第一千年中期），在现今埃塞俄比亚的北部疆域，阿高诸语言曾是主要语言。在现今埃塞俄比亚闪米特诸语言（阿姆哈拉语、提格雷语、提格里尼亚语）通行的地区，操阿高语的居民只保留了一些面积不大的孤岛状地块。埃塞俄比亚闪米特诸语言（吉兹语等）的词汇中，可以查找到古阿高语的一些主要底层词。

阿高诸语言有着典型的库施特诸语言的音位系统。存在塞擦音（č, ʒ），声门化辅音k，与普通软腭音系列（k, g, x, ŋ）并存相应的圆唇软腭音系列（kʷ, gʷ, xʷ, ŋʷ），在奥恩吉语中还有一些圆唇小舌音（qʷ, ɢʷ）。元音系统的特点是有6个音位：i, e, ə, a, o, u；不存在长度上的对立。发现有音域声调（比林语两个，奥恩吉语3个），重音无音位性质。动词词根结构为CVC、CVCC、CVCVC，名词词根结构为CVC、CVCV。

名词的特点是具有语法性范畴（单数的阳性和阴性由形态确定，如奥恩吉语gərm-i ‘雄性野猪’、gərm-a ‘雌性野猪’，或者根据与定语的一致关系确定）、数范畴（单数和复数）、格范畴（不少于6个后缀格：主格、宾格、与格、伴随格、夺格和修饰名词的属格（物主格），属格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具体取决于被限定词的性、数、格，如奥恩吉语中aqi-w sən ‘一个人的兄弟’、aqi-t sən-a ‘一个人的姐妹’）。形容词作为一个独立的词类形式上没有区分标记。阿高语中都有格形式变化的独立人称代词（属格用于物主意义）、指示代词（有两个直指词（дейксис））和疑问代词。比林语中采用行为客体的人称、数和性的后缀标志，这些标志是动词词形的组成部分，源于代词（像闪语一样）。动词系统相当发达，按人称、数变位，用于单数第三人称时，还要根据主体的性属变位。此外，还区分肯定、否定、疑问3种状态形式，不少于4个式——直陈式（предикатив）、命令式、祈愿式（юссив）（祈使式）、条件式；奥恩吉语中有7种式；3—4个时，还有使役、被动和反身词基，奥恩吉语中有受益词基，或称предестинатив（为某人所进行的行为）。动词格范畴尤其特别，在其他库施特语言中也存在：述谓格（述谓）动词相当于欧洲语言中的主句谓语，而间接格动词则相当于欧洲语言中的各类从句谓语、形动词、副动词、不定式。与真正形动词、副动词等不同的是，间接格动

^{*}本栏目刊登的选译词条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词典》翻译工程”（11&ZD131）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由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承担，译者和审校者均为项目组成员。

词可以根据主体的人称、数、性进行变位。动词格的形式标志及其组合，只是部分，而不是完全和名词格相吻合（试比较：奥恩吉语中属格的形式：aqi- k^w ḡṇká ‘一个人的房子’和 des-ák^w ḡṇká ‘我在那儿学习的房子’、des-ták^w ḡṇká ‘你在那儿学习的房子’等）。比林语和奥恩吉语的动词格超过15个。变位通过后缀变化进行，但奥恩吉语和汉坦加语有4—5个动词保留了古代前缀变位的遗迹。

阿高诸语言最重要的**构词**和词变手段是**后缀法**、**前缀法**、**重叠法**、词根辅音交替法（如比林语单数主格gix ‘一只尖角’—复数主格gikók ‘尖角’）和内部曲折法使用范围较窄。在奥恩吉语和在比林语中，名词词形经常以光杆词根形式出现。

阿高诸语言的句中词序和库施特共同语一致。定语一般位于被限定词之前；但在比林语中定语也可能后置，这时属格定语要带上被限定词的格标志。名词谓语可以有两种表达方式：或者用特殊的述谓格直接做名词谓语，像动词那样，有各种时、式、与主体一致的人称（数）、性的形式（奥恩吉语）；或者借助**系词**（比林语）。

该族语言无文字。有关阿高诸语言的书面资源不多：有一些用拉丁字母、埃塞俄比亚字母拼写的民间创作文本和圣经译文（比林语）。

19世纪末，L. 赖尼施出版了内容相当全面的比林语、哈米尔语、夸拉语词典和语法著作，为阿高诸语言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12年，C. 孔蒂·罗西尼描写了克曼特语。此后，阿高诸语言研究中断了大约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得以重新恢复。主要研究成果有F. R. 帕默的论著（比林语和奥恩吉语的动词、名词、声调和音位系统）、R. 赫茨隆的论著（奥恩吉语的动词和名词）、D. L. 阿普尔亚德的论著（克曼特语和汉塔语描写）。在描写库施特、闪米特—含米特诸语言的综合论著中，也有关于阿高诸语言的探讨内容（参见**非洲学**）。

Gospel of Mark in the Bilin or Bogos language, Vienna, 1882.

Reinisch L., Die Chamirsprache in Abessinien, «Sitzungsberichte der Wissenschaft», 1884, Bd 105—06.

Его же, Die Quarasprache in Abessinien, там же, 1884—87, Bd 103, 109, 114.

Его же, Die Bilin-Sprache in Nordost-Afrika, Bd 2, W., 1887.

Conti-Rossini C., Noti sugli Agau, pt 1—2, «Giornale della Società Asiatica Italiana», 1905, v. 17—18.

Его же, La langue des Kemant en Abyssinie, W., 1912.

Palmer F. R., The noun in Bil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58, v. 21, pt 2.

Hetzron R., The verbal system of Southern Agaw, Berk. — Los Ang., 1969.

Appleyard D. L., A descriptive outline of Kemant,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75, v. 38, pt 2.

Language in Ethiopia, East Lansing—L., 1976.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Берберо-ливийские языки）

（作者：A. Ю. 米里塔廖夫[A. Ю. Милитарёв]；译者：徐英平，哈尔滨师范大学）

又称柏柏尔诸语言（Берберские языки）。**亚非诸语言**的语族之一（包括**关切诸语言**），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与**闪米特诸语言**有一系列单独的形态**同言线**，而与**乍得诸语言**有很多词汇**同言线**。

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通行于北部非洲，自地中海沿岸到北纬12度（由北向南），从大西洋沿岸到东经25度（由西向东），分布并不均衡。在摩洛哥约有250万希尔哈人说塔舍尔希特诸方言，200余万“柏拉柏尔”人说塔马齐格特诸方言，约有150万里夫人、森哈贾和其他部落的人使用泽内特（又称泽纳提——译者注）诸语言。在阿尔及利亚北部，连片地区的柏柏尔居民，其中包括卡比尔人（约260万）、沙维亚人（约100万）和其他部落人群都

使用泽内特诸语言及其方言。此外，泽内特诸语言在阿尔及利亚的撒哈拉绿洲（约有 30 多万人）、突尼斯的个别地点（约有 10 万人）及利比亚西北部也常见到。利比亚的几个绿洲地区（约 30 万人）和埃及西北部的锡瓦绿洲（约 1 万人）使用东支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使用南支诸语言的是图阿雷格人（超过 100 万），他们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撒哈拉地区、利比亚（费赞西部）、尼日尔（阿伊尔高原）、马里（伊福拉斯高原和尼日尔河谷）、尼日利亚及布基纳法索（多里地区）。在毛里塔尼亚西南部（可能还有塞内加尔西北部）约有数万人讲泽纳加语。使用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的总人数超过 1100 万。

据考证，统一亚非语瓦解（推测在公元前第 11 至公元前第 9 千年的西亚）后，柏柏尔—利比亚人在公元前第 3 千年初曾在利比亚沙漠地区生活。移居地中海沿岸后，一部分人于 7 至 11 世纪被阿拉伯人排挤到非洲大陆内地，另一部分人改持阿拉伯语。从语言年代学看，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在公元前 13 至公元前 12 世纪发生分裂，这与利比亚人多次遭受埃及人沉重打击的时间是相吻合的。

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分为 4 个语支：1) 东支（西瓦语、奥吉拉语、索克纳语、福卡哈语和加达梅斯语等语言）；2) 南支，又称图阿雷格语支，包括：北图阿雷格次语支（加特语、阿赫涅特语、塔马哈克语及其泰托克、阿杰尔和阿哈加尔等方言、阿伊尔语、克尔格雷语等，东陶列梅特语（Tawellemmet language）及其阿扎瓦格赫和克尔安桑戈等诸方言）；南图阿雷格次语支（克尔阿罗卡斯语、西陶列梅特语、塔德格哈克语、塔内斯勒姆特语及其舍里芬、克尔安特萨尔等方言、伊达乌萨克语等语言）；3) 西支，即泽纳加诸方言；4) 北支，包括：a) 阿特拉斯次语支（塔舍尔希特语的廷杜夫特、伊格利乌阿、塔泽尔瓦利特、伊达乌森木拉尔和恩蒂法等方言；塔马齐格特语，又称“柏拉柏尔”语的阿伊特伊兹杰格方言和伊扎伊安方言等；b) 泽内特次语支（塞格鲁欣诸语言、里夫语及其诸方言、森哈贾语、伊兹纳森语、斯努斯语、贝尼梅纳塞尔语、申瓦语、姆扎布语、瓦尔格拉语、菲吉格语、图亚特语、古拉拉语、沙维亚语及其诸方言、塞内德语、杰尔巴语、祖阿拉语、内富萨语及其诸方言等）；c) 卡比尔次语支（大、小卡比利亚诸方言）。此外，用来书写三批古文献（公元前 10 世纪末到公元前 10 世纪上半叶）的菲赞—黎波里塔尼亚语、西努米底亚语和东努米底亚语也属于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这些语言已消亡。

大多数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辅音系统的特征有：短/长（松/紧）的音位对立；齿音、咝音和软腭音系列清、浊、咽化（“强势”音）的三元对立；伴随软腭塞音、齿塞音塞擦化的擦音化和/或硬腭化；与腭元音或者唇元音相邻时，s 转换为 š；w/v, y/i 之间发生随位交替，ww 变为 gg。在北支诸语言中常见唇腭咽辅音。咽音 h, ʕ 常见于阿拉伯语借词中，某些情况下固有词汇中也可见。亚非语的咝音在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中体现为 s；咝塞擦音（ç 除外）体现为 z；前舌强势音体现为 ʒ 和 ɖ；唇音 *f 和 *p 体现为 f, *b, *p 体现为 p；喉音和咽音（*ʕ > ʕ 除外）体现为 h (> ʔ)；小舌音系列 *ħ, *kħ, *kħ, *gʕ 体现为 g, k, γ, γ。元音系统在图阿雷格诸语言和加达梅斯语中呈现得最充分，在阿特拉斯次语支中弱化的程度最大，以致因元音消失而经常出现数个辅音连缀的现象。

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的名词有性（阳性和阴性；前者借助前后缀（конфикс）t-...-t 构成单数，借助前缀 t-构成单数和复数；这些标志也用来构成单数、指小）和数的范畴（单数和复数，借助后缀 (i) n 和/或元音交替（аблаут）构成）。南支和北支柏柏尔—利比亚语中有状态（关联状态和非关联状态）范畴。在领属结构中使用属格语气词 n，空间关系借助前置词表达。

人称代词分为孤立人称代词（用作赘语对动词加以强调）、后附人称代词和后缀人称代词。动词词干区分为祈使式词干/未完成体词干（传统的不定过去时（аорист）词干）和完成体词干（传统的过去时（претерит）词干）。为了表达补充的时体意义，经常使用语气词（如将来时用 ad）。派生动词形式（词基[порода]）借助前缀（有时借助后缀）*s-（表示使

役)、*t-/*tu- (表示被动—反身)、*m-/n- (表示反身) 或者这些构形成分的组合构成。式有陈述式和祈使式两种。句中通常词序为 VSO。

词根由一个或数个辅音构成, 三个辅音构成的最常见。在动词词根中三辅音式占多数, 这显然是由于脱落的喉音和咽音的重构以及 w/u, y/i 的交替造成的。在最初的名词词根中常有一个稳定的元音, 它既可能是对脱落的辅音位置的补偿, 也可能是固有的。

除图阿雷格诸语言外, 所有的柏柏尔—利比亚语都有大量的阿拉伯语借词 (某些语言, 特别是泽纳加语和个别的东柏柏尔—利比亚语, 只是作为被阿拉伯方言包围的孤岛而残存着, 已处于灭绝的边缘), 但基本词库 (лексический фонд) 中仍保留着共同亚非语词的核心。另外有源自希腊语、拉丁语及现代欧洲语言的借词。在图阿雷格诸语言中还有源自乍得和尼罗—撒哈拉诸语言的借词。

北非很多最古老的历史文献都用利比亚辅音文字的各种变体刻写 (北非和撒哈拉不同地点的岩刻、墓志铭和其他碑文: 东、西努米底亚的, 以及加那利群岛上发现的碑文)。著名的还有罗马时期利比亚用拉丁字母表拼写的碑文, 元音也以字母体现出来。撒哈拉图阿雷格人唯一传承至今的柏柏尔语固有字母表, 即所谓的提芬纳格文字, 也起源于利比亚文字。

对于柏柏尔—利比亚活语言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 1) 欧洲研究者和传教士的最初观察记录, 他们用各种欧洲语言语法术语对最重要的方言加以描写; 2) 以法国学派为主的职业语文学家 (从 19 世纪末起) 对大部分方言进行的或多或少比较全面的描写。引人注目的是 R. 巴塞和 A. 巴塞父子的著述, 涵盖几乎所有方言和柏柏尔语的广泛语言学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的其他柏柏尔学家还有: 传教士 Ch. 富科, 4 卷本《图阿雷格语阿哈加尔方言词典》的作者、S. 比亚内、E. 德坦、E. 拉乌斯特、G. 施图姆、F. 贝吉诺、H. 马西、G. 科林、E. 伊巴涅斯、A. 皮卡尔和 F. 尼古拉斯。50 年代出版了努米底亚死语 (J. 沙博) 和关切死语 (D. 韦尔费尔) 基础资料汇编。在 M. 佩尔、B. 帕拉迪西、J. 朗弗里、L. 加兰、J. 科尔塔多、M. 马迈里、J. 阿普尔盖特、T. 庞谢恩和 A. 阿卜杜勒—马西赫和《图阿雷格语基础语法》的作者 K. 普拉瑟等研究者的论著中继续进行方言资料的积累与对比工作。迅猛发展的亚非诸语言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由于纳入了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的语料, 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很多已有的认识, 其中包括关于柏柏尔语是诸多亲属方言集合的认识, 从而产生编写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历史比较语法和词典的需要, 苏联目前正在开展这些工作。

Zavadovskij Ю. Н., Берберский язык, М., 1967.

Laoust E., Mots et choses berbères, P., 1920.

Basset A., La langue berbère. Morphologie. Le verbe, P., 1929.

Его же, Atlas linguistique des parlers berbères, fasc. 1—2, [Alger], 1936—39.

Его же, La langue berbère, [Oxf.], 1952.

Nicolas F., La langue berbère de Mauritanie, Dakar, 1953.

Rössler O., Die Sprache Numidiens, в кн.: Sybaris. Festschrift Hans Krahe, Wiesbaden, 1958.

Wölfel D. J., Monumenta linguae Canariae, Graz, 1965.

Prasse K., À propos de l'origine de H touareg, Kbh., 1969.

Его же, Manuel de grammaire touarègue, Cph., 1972—1973.

Applegate J., The Berber language, в кн.: Afroasiatic: a survey, The Hague, 1971.

Galand L., Langue et littérature berbère, P., 1979.

Destaing E., Dictionnaire français-berbère, P., 1914.

Foucauld Ch. de, Dictionnaire touareg-français, t. 1—4, [P.], 1951—52.

Dallet J.-M., Dictionnaire Kabyle-Français, P., 1982.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词汇学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作者: В. Г. 加克 [В. Г. Гак]; 译者: 徐来娣: 南京大学)

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研究语言的词的总汇,亦即**词汇**。词义学的研究对象包括语言词汇的以下方面:词作为语言基本单位的问题,词汇单位的类型;语言词汇的结构;词汇单位的功能;词汇扩充和发展的途径;词汇和语言外部现实。词汇单位的各种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反映在词义学的诸多范畴中。

词作为语言基本单位的问题在词的普通理论中加以研究。词汇单位不仅包括单个的词(整体单位),还包括固定**词组**(分析单位,或称合成单位),然而基本的词汇单位是词。因为词是以形式和内容相互关联为特征的单位,所以词作为语言单位的问题通常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结构方面(词的划分、词的结构)、语义方面(词的词汇意义)和功能方面(词在语言结构和言语中的功用)。

在结构方面,关于词的词义学理论的基本任务,是确定词的单独性和同一性的标准。确定词的单独性标准,就是将词和词组进行对比,揭示词的整体性和单独性特征,研究词的分析形式问题;而确定词的同一性标准涉及到确定词的常体,词的常体不仅是词的各种语法形式的基础(因此要对**词形**范畴加以定义),而且是词的各种变体——语音变体、词法变体、词汇—语义变体的基础(因此要研究词的变体问题)。

词汇单位的语义分析是词汇语义学的研究对象。词汇语义学,或称**词义学**(семасиология),研究词与词所表达的概念(**概念意义**)之间、词与词在言语中所指客体(**指物**)之间的对应关系。意义学和词义学紧密纠缠在一起,通常被纳入**语义学**(семантика)的框架之中。词义学研究词的语义类型,区分词义学的各种范畴,这些范畴反映词汇单位的诸如单义和**多义**、通用义和专用义、抽象义和具体义、广义和狭义(上义词和下义词)、逻辑义和主观修辞义、直义和转义等语义特征。词义学特别关注多义词汇单位的语义结构,揭示词的意义类型及其区分标准,以及词义变化和发展的途径;分析语义消失现象——词丧失其词汇意义,向语法标记转化。

在功能方面,词作为语言单位,可以从其在语言结构、语言整体运作中的功用角度来研究,也可以从词和其他层面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角度来研究。尤其重要的,是词汇和语法之间的相互作用:词汇给予语法范畴的使用以种种限制,而语法形式又有助于词义的相互区别。有共同意义的词汇、语法手段构成词汇—语法场(表数量、时间等)。

词汇的结构从两个方面加以研究:词汇单位之间的系统关系和词层划分。词义学把语言的词汇作为系统的系统来研究。构成总系统的各个词群可以根据它们的外延、共性基础(形式或内容)、词汇单位形式或意义的相似程度、词汇单位之间的关系特征(**聚合关系**或**组合关系**)相互区别。单个词汇单位基于形式相似的最小组群形成同音词(参见**同音关系**)或形似词(在不完全相似的情况下;参见**形似关系**)。依据内容将组群划分为基于概念—逻辑关系的聚合类型——等义(**同义词**)、对立(**反义词**、**转换词**: дать ‘给予’ — получить ‘得到’)、邻位(语义列: сосна ‘松树’ — берёза ‘白桦树’ — дуб ‘橡树’、тёплый ‘温暖的’ — горячий ‘热的’)、包容(上义词—下义词关系: дерево ‘树’ — берёза ‘白桦树’;参见**上下义关系**(поронимия))组群;或概念—逻辑关系的组合类型(物体—特征、部分—整体等)。

词义学还研究更大的词的组群——**词场**。词场同样以形式(如词族)或内容为基础,根据聚合关系或组合关系构成。聚合场和组合场的总和构成主题场,主题场反映语言外现实的特定领域(如交通工具、畜牧业、艺术等)。如果顾及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多义性**、**同义性**、**构词联系**等),那么没有任何一个部分的词汇是孤立存在的,任何词汇单位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关系。

语言的词汇不是均质的,而是有词层区分的。依据不同,词汇中区分出来的词汇单位范

畴也不同。根据使用范围，可以区分通用词（语体通用词）和语体标记词，后者用于特定交际条件和交际范围（如诗歌词、口语词、科技词、职业词、**俗语词**、黑话词、地域词、**方言词**）。鉴于标准语变体的研究，还区分这些变体的特有词汇。根据情感色彩，可以区分中性词和情感标记词（表情词）。根据历史视角，可以区分**新词**、古词（参见**旧词**）。根据词的来源或者词所表达现实的来源，可以区分**外来词**、异域词（指称异域现实）、外语词、**国际词**。根据词和语言体系的关系以及词的功能，可以区分积极词和消极词、潜在词、随机词。在语言的所有子系统中，词汇系统是最不严格的。词群之间的界限不明确，同样一个词，由于意义和用法不同，可能属于不同的词汇单位范畴。

在研究词汇的使用时，通常关注下列一些问题：词汇在语篇中的使用频率；**言语**中的词汇、**篇章**中的词汇、词汇的称名功能、语境中的词义变异和使用特殊性（很多词义学范畴在言语中会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呈现，因而区分语言和言语的同义词、反义词。词汇的多义性和同音性在言语中通常会被排除，或者以文字游戏或语义**融合**的面目取而代之）；词的**搭配性能**通常在语义层面（词汇单位所表达的概念的相容性：каменный дом[石头房子]、рыба плавает[鱼在水中游]）和词汇层面进行研究（词位的彼此相容性：читать лекцию[讲课]，但是 делать доклад[作报告]）。一般还区分自由搭配和非自由搭配。非自由搭配包括**熟语学**的研究对象——语义融合搭配（идиоматические сочетания）。

词义学研究语言词汇的扩充和发展途径，通常区分四种**称名**方式。其中有三种称名方式以运用语言内部资源为基础：新词的创造（参见**构词法**）、新义的形成（多义性、转义，同时还研究意义派生规律）、词组的构成。而第四种称名方式以吸收其他语言资源为基础——借入外来词（借词和**仿造词**）。词义学还研究外来词归化的因素和形式。

词义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面是在词与现实的关系中研究词，因为也正是在词中，在词的意义中，通过最直接的方式记载了语言群体在特定时期的生活经验。与此相关的研究包括诸如词汇和文化、语言的相对性（词汇对“世界图景”的影响）、词义中的语言内部要素和语言外部要素、背景词汇等问题。

词义学区分为普通词义学、专门词义学、历史词义学、对比词义学和应用词义学。**普通词义学**揭示人类语言词汇结构、功能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专门词义学**研究单一语言的词汇。

历史词义学研究词的历史，并把词的历史研究和词所表达的事物、概念及社会规约的历史结合起来。历史词义学的成果广泛应用于历史学科。历史词义学动态地描写词汇（或者词汇局部）的历史变化过程，或者静态地描写语言的某个断代（срез）的历史状态。历史词义学的研究对象可以是个别词或者词汇体系（概念场）、词本身的历史或者词义变化形式（如词义缩小）、词的语义结构变化过程（如研究抽象义词的演变、同义化的过程、**专有名词**的出现等）。按照研究方向，历史词义学研究可以侧重意义学（研究词或词群的意义变化）或者**名称学**（研究客体称名方式的变化）。在研究词群时，由于词汇内部有系统性关系的缘故，上述两个方向会同时进行。

对比词义学的词汇研究目的是揭示语言起源的亲属关系、语言之间的结构—语义异同（不取决于语言的亲属关系），或者揭示词义学的普遍规律（多半是语义规律）。对比可以涉及词汇的任何方面。可以对比单个的词，但是对比词群（或场）更有意义，如运动动词、亲属称谓等。这样的对比可以表明，不同语言的词汇手段在切分所指场（客观现实）上有何不同，不同语言将各种客体的哪些方面固定在词的意义中。对比词义学的重要兴趣所在是，对比两种语言众多词义学范畴的功能：同义关系、**反义关系**、词的多义类型、熟语及词义中普遍义与个别义之间和逻辑义与情感义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对比词义学的成果广泛应用于语言学的各种应用分支（词典学、翻译学）以及民族学。

应用词义学主要包括 4 个领域：**词典学**、翻译、语言教育和**言语修养**。每个领域都丰富了词义学的理论。如词典学促使人们深入考察词义问题，完善词义的描写和划分，研究词

的搭配性能等；翻译为对比词义学提供大量语料；母语和非母语教学过程中遇到诸多词的问题，它们使得一系列普通词义学问题变得更加尖锐（词与上下文、词的搭配、同义关系[词的选择]、词汇与文化）。与此同时，每个领域又都要运用词义学的原理和论断。然而，在不同的领域中，词义学的范畴有各自独特的呈现方式，如词典学中的词义区分问题、熟语问题，由于词典类别的缘故，而有不同的处理方案。

词义学采用普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参见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最常用的方法有：分布法（词的界限确定、形态结构确定、词义划分等）、替换法（同义关系研究、词的多义研究）、成分对立法（词汇单位词义结构的确定、词作为一个整体的语义结构确定、语义场分析、词汇单位意义的变化、词汇单位意义在上下文中的实际化）、转换法（构词学中、通过紧缩或展开句法结构揭示词的上下文语义负荷时、确定词汇单位的意义时使用）。除了定性的研究方法外，还有数量一统计法（词汇单位频率的确定、词汇单位各种组合联系的确定等；参见语言学的定量法）。

词义学的成果应用于很多相邻学科：**心理语言学**（研究词的联想关系等）、**神经语言学**（失语症的类型）、**社会语言学**（研究社团语言行为）等。词汇单位的某些方面和某些类型有专门的语言学分支加以研究（参见**专名学**、**熟语学**、**言语修养**、**修辞学**、**构词学**等）。

词义学分离成为语言学的独立分支学科较之其他分支学科，如语法学，略迟。即便到了20世纪，还有一些早期结构主义流派否定词义学独立出来的必要性，他们的根据或者是“词汇的结构程度较弱”，或者是“语言学根本就没有必要研究语义学”，而语义学恰恰又是词义学的核心部分（L. 布龙菲尔德学派）。

有关词义学的许多问题，在词义学成为语言学的特殊领域很久之前，人们就已经在探讨了。古代和中世纪时期研究的是词的意义和结构问题。古典修辞学曾经关注词的美感功能。16—18世纪欧洲词典学的发展促进了词义学的发展。一些详解词典的前言（如法兰西学院词典，1694；S. 约翰逊英语词典，1755）曾涉及一系列词义学范畴（同义关系、词汇搭配性能、初始词和派生词等）。1765年D. 狄德罗和J. L. 达朗贝尔的法国百科全书首次采用“词义学”这一术语。书中把词义学定义为语言学说的两大分支之一（与句法学并列）。作者认为，词义学的任务是将词从言语的具体使用中剥离出来加以研究，研究语言词汇组织的一般原则。他们把词义学区分为词的外部形式研究、词汇意义研究和**词源学**研究（有人认为词源学也包括构词学）。在18世纪的修辞学专题论文中，学者们较为详尽地阐述了词的转义形成途径。**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的早期的一些论著（R. C. 拉斯克、F. 葆朴）奠定了比较词义学的基础。19世纪欧洲词义学探索的主要领域是语义学：研究**词的内部形式**（W. F. 洪堡特）、词义形成和演化的普遍规律（A. 达梅斯泰特、H. 保罗），历史词义学取得了长足发展。M. 布雷尔的著作（1897年）将意义学的成就进行了总结和发展，意义学在书中作为一个语言科学的特别分支体现了出来。20世纪意义学继续向前发展，一方面，着眼于引进逻辑学或心理学的成果，以揭示词义演变的普遍规律（E. 卡西雷尔、H. 克罗纳瑟、S. 乌尔曼、G. 斯特恩等），从而催生了后来的研拟语义**共相**的工作；另一方面，着眼于把词的历史与客体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词与物”流派，这个流派的特点表现在比如说方言学中）。词义学中的名称学方向促进了词群的研究，B. 夸德里的专著（1952）中对此曾有论述。

语言现象具有系统性的思想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词义学领域中，这个思想首先反映在以聚合（J. 特里尔）和组合（W. 波尔茨格）原则为基础构建的词汇场理论上。词汇场理论的结果是，词条的组织按照**义类词典**的方式体现（C. 巴利、R. 哈利格、W. von 瓦特堡）。词作为语言单位的普通理论被深入地加以研究，继续讨论词的独立性及其标准（巴利、A. 马丁内、J. H. 格林伯格等）、词的语义（C. K. 奥格登、I. A. 理查兹、K. 巴尔丁格）。词汇与语言外部世界的相关性研究、社会史中词的历史研究（P. 拉法格；**法国社会学派**：A. 梅耶、E. 本维尼斯特、G. 马托雷、M. 科昂）、词汇与说话人意识结构的研究（E. 萨丕尔、B. 沃

尔夫、L. 魏斯格贝尔) 得到迅速发展。**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揭示了词汇的功能差别。

俄罗斯词义学的基础是由 М. В. 罗蒙诺索夫在其论著中奠定的, 他把注意力放在词汇的修辞差别上(《三种语体理论》), 同时也关注词汇的历史演变性质(关于语言基本词库(словарный фонд) 具有稳定性的结论)。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 由于词典编撰工作以及俄语史、斯拉夫诸语言史的研究工作, 历史词义学和词源学得到积极发展(А. X. 沃斯托科夫、И. И. 斯列兹涅夫斯基、Я. К. 格罗特等人), 词汇的地域区别和社会区别、作家语言词汇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也展开了研究(В. И. 达利、А. И. 索博列夫斯基、И. А. 博杜恩·德·库尔特内)。

对世界词义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是 А. А. 波铁布尼亚、М. М. 波克罗夫斯基的论著。波铁布尼亚深入研究、构建了词的普通理论, 不仅涉及词的形式层面, 而且还特别地涉及词的内容层面(词的内部形式学说的深化, 关于词的近义(语言内部意义) 和远义(语言外部意义) 学说, 词的语义关系、多义性、词义多变性观点)。波克罗夫斯基的论著(19 世纪 90 年代) 奠定了普通意义学的基础, 揭示了词义演变的普遍规律。

在继承俄罗斯语言科学优良传统的同时, 苏联的词义学研究以各种语言为语料, 范围日益拓展。对此起促进作用的是俄语的深入研究、苏联各民族语言的科学研究、积极的词典编撰活动、以及词义学作为必修理论课程纳入苏联高等语文教育体系。正是在苏联, 词义学被确定为一门单列的大学语言学课程。

在革命后的年代, 首先扩大了词汇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不同居民群体的词汇研究、1917 年十月革命引起的各种词汇变化研究)。这一时期在**语言与社会**问题领域完成的论著奠定了苏联及世界**社会语言学**的基础, 社会语言学的奠基和发展体现在 Е. Д. 波利瓦诺夫、Б. А. 拉林、Д. С. 利哈乔夫、В. М. 日尔蒙斯基、Н. Я. 马尔、В. В. 维诺格拉多夫、Ф. П. 费林、Р. А. 布达戈夫等的著作中。文学创作语言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大量作家语言研究的论著相继发表(А. С. 普希金、М. Ю. 莱蒙托夫、Н. В. 果戈理、М. Е.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М. 高尔基、Т. Г. 谢甫琴科、И. 弗兰科等作家的语言)。苏联学者对词层划分, 以及各种方言民间变体的词汇特点和用词特点也在做深入的研究。

苏联语言学工作者以词是语言基本单位的原理为出发点, 对词的普通理论、词的界限确定、词与概念的相互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А. М. 佩什科夫斯基、Л. В. 谢尔巴、В. В. 维诺格拉多夫、А. И. 斯米尔尼茨基、Р. О. 绍尔、С. Д. 卡茨内尔松、О. С. 阿赫马诺娃、Ю. В.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词的语义方面受到特别的关注(Л. А. 布拉霍夫斯基、В. А. 兹韦金采夫、Д. Н. 施梅廖夫、Б. Ю. 戈罗杰茨基、А. Е. 苏普伦等)。苏联词义学的成就是做出了词义的类型划分(В. В. 维诺格拉多夫)、词的词汇—语义变体学说(А. И. 斯米尔尼茨基)、词义发展的过渡环节理论(Л. З. 布达戈夫)。正是由于上述研究成果, 词的多义性问题才有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在词作为语言单位的研究和词汇**共时**研究的同时, 苏联语言学工作者还致力于词源学(О. Н. 特鲁巴切夫)、历史词义学(Ф. П. 费林)、**标准语**词汇史(Ю. С. 索罗金)等领域研究。有数量众多的专门以同义关系、反义关系、国际词、术语、熟语等词义学范畴为对象的研究著作问世。70—80 年代, 在研究各种语言所有词层和词的所有方面时, 都特别关注包括聚合关系在内的词汇的系统性问题、(施梅廖夫、А. А. 乌菲姆采娃、Ю. Н. 卡拉乌洛夫), 词汇语义学与**称名**和**指称**普通理论的联系、词汇和其他语言层面(首先是句法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Ю. Д. 阿普列相)、词汇的心理语言学方面(词汇联想研究等)、不同语言的词汇对比研究(Р. А. 布达戈夫、В. Г. 加克)。具有重大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的还有苏联各民族语言词汇方面的相互作用研究(Ю. Д. 杰舍里耶夫、И. Ф. 普罗琴科)。词义学研究的方法论也在积极地进行建构(М. Д. 斯捷潘诺娃、Н. И. 托尔斯泰、Э. М. 梅德尼科娃等)。

Смирницкий А. И.,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56.

- Ахманова О. С., Очерки по общей и русской лексикологии, М., 1957.
- Звегинцев В. А., Семасиология, М., 1957.
- Будагов Р. А.,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семас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оманские языки), М., 1963.
- Кацнельсон С. Д., Содержание слова, значение и обозначение, М.—Л., 1965.
- Степанова М. Д., Методы синхрон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лексики, М., 1968.
- Вейнрейх У., О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е языка, пер. с англ., в кн.: «Новое в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в. 5, М., 1970.
- Маковский М. М., Теория лексической аттракции, М., 1971.
- Шанский Н. М.,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2 изд., М., 1972.
- Дорошевский В., Элементы лексикологии и семиотики, М., 1973.
- Апресян Ю. Д., Лекс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 М., 1974.
- Степанова М. Д., Чернышёва И. И.,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немец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75.
- Караулов Ю. Н., Общая и русская идеография, М., 1976.
- 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В.,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т. 3,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и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 М., 1977.
- Гак В. Г., 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ая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М., 1977.
- Лопатникова Н. Н., Мовшович Н. А.,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82.
- Quadri B., Aufgaben und Methoden der onomasiologischen Forschung, Bern, 1952.
- Ullman S., The principles of semantics, 2 ed., Glasgow — L. — Oxf., 1959.
- Weinreich U., Lexicology,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The Hague, 1963, v. 1.
- Rey A., La lexicologie. Lectures, P., 1970.
- Lyons J., Semantics, v. 1—2, Camb., 1977.
- см. также литературу при статьях *Слово*, *Лекс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слова*.

(田文琪、张家骅 审校)

词源学 (Этимология)

(作者: Ж. Ж. 瓦尔波特 [Ж. Ж. Варбот]; 译者: 刘永红, 华中师范大学)

1) 研究词来源的语言学分支; 2) 以揭示词的来源为目标的研究方法总和, 以及揭示结果本身; 3) 词的来源。在 19 世纪的语言学中, 术语“词源学”也用于“语法学”这一意义。

词源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其对象是研究形成语言词汇组成的各种来源和过程, 构拟远古时期 (通常是有文字之前的时期) 的语言词汇组成。每一种语言的词汇中都有大量的词, 它们的形式与意义有什么联系语言持有者并不懂得, 这是因为词的结构无法依据语言中现有的构词模式来加以解释的缘故。词的历史变化模糊了词的原初形式和意义, 而词的符号性质决定了构拟初始理据 (即词的初始形式与意义的联系) 的复杂性。词的词源学分析目的, 是确定一个词产生于何时、何种语言、何种构词模式、何种语言材料基础上、何种形式、何种意义, 以及其初始形式和意义的哪些历史变化决定了研究者现今已知的形式和意义。构拟词的初始形式和意义是词源学分析的课题。比如, 斯拉夫诸语言中 *омела* ‘槲寄生’ 这种植物的各种名称, 允许假设一个由动词词干 *em- ‘拿, 抓’ (俄语 *вз-ять* ‘拿’, *воз-ьму* ‘我拿’ 由此而来) 构成的原始斯拉夫语初始词位 *emela (及其诸多变体)。但是其原初理据有两可解释: 该植物之所以称为 ‘拉住、抓住、钩住 (某物, 如鸟和其他植物) 的 (槲寄生)’, 是因为从中可提取捕鸟胶, 或者因植物的寄生方式而得名。

词源学的特点是研究方法的综合性。词源学分析操作程序的实质是: 将所考察的词或其词干与另一个作为初始的生产词或其词干建立发生学上的等同关系, 以及将词的其他结构成分与历史上已知的结构成分等同起来, 构拟有原初理据的词的原初形式和意义; 词源学分析的一个必需阶段是去除后来的历史变化。研究语言各种不同单位的历史比较法是词源学方法

论的基础，该方法以语音变化规律、形态的规律性、形态变化的规律性等为依据，这些方面都是比较语法学的研究对象。根据词所经历的历史变化性质以及词与词源分析个别情况下得出的一些潜在亲属词位的对应关系，分析词的不同结构成分或词的意义，具有主导的作用。如俄语的 тормозить ‘拽，摇动’、乌克兰语的 термосити ‘调温器’和波兰语的 tarosić, termosić ‘拽拉’均可解释为由动词词干 ter- ‘揉搓；撕开’（俄语的 тереть ‘揉搓’）派生构成的，但是对这些动词语音差别的分析（特别是俄语 ш 与乌克兰语 с、与波兰语 s’）可以证明：古派生动词的直接延续只能是波兰语的 tarosić，而俄语和乌克兰语动词是从波兰语借入的。在对俄语词 лоно 进行词源学分析时，为证明它由动词-ложить 派生，最具实质意义的就是在单词中分离出词根 лог-和后缀-сно 的可能性，这可以带词根 лог-和后缀-сно 的意义相近词 ложесна ‘内脏’的结构佐证。

词源学分析时，解释词的各种意义联系、意义发展以及构拟词的原初语义异常困难。这是因为语义变化多种多样，幅度极大（试比较俄语标准语词 канава ‘沟’与新西伯利亚方言词 канава ‘厩肥砖围墙’、标准语词 пылкий ‘热烈的’与沃洛格达方言 пылко холодный ‘极寒冷的’、俄语词 прозрачный ‘透明的’与捷克语词 prozračno ‘阴沉地’），语义变化与语言外现实事物相关联、对语义变化类型和称名原则研究不足，也是困难的原因。词源学研究语义，其分析的支柱是语义平行对照法：举出一些类似的意义发展（或组合）情况，以证明意义发展（或者意义组合可能性）的假设。如为了证明动词 таращить（在词组 таращить глаза ‘瞪圆眼睛’中）属于词族 тереть ‘揉搓’（其常规意义是‘撕开，瓦解，去壳’），可以用德语词 reißen 的相近意义发展‘撕开’→‘瞪圆’加以说明（试比较 die Augen reißen ‘瞪圆眼睛’）。语义变化和意义组合只有一部分可用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来加以解释（пропасть ‘深渊’→‘大量’，близко ‘临近’→‘很快’，сильный ‘有力量的’→‘迅速的’→‘放肆的’等变化就是如此）。大部分的语义迁移和意义组合都受制于现实事物的相互关系、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语言持有者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因为词语的意义都是物质世界的反映。阐释语义变化和采用语义平行对照法都应基于有关人类周围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全部知识总和，这些知识是各个不同科学领域积累起来的，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些知识的历史发展。比如要确定俄语 двигать ‘推动’与德语 Zweig ‘树枝’的亲属关系及其源自 два ‘二’的派生关系，须通过构拟动词 двигать 的原初意义‘举起’，并从技术史中引用相关信息才能实现（使用末端一分为二的棍棒和树枝作为举起重物的杠杆，这类棍棒和树枝的意义可能派生自 два，如 двойная ‘双重的’）。要解释拉丁语 rex ‘国王’、regere ‘主宰’与斯拉夫语 řězati ‘切割’的亲属关系，只有了解清楚远古社会国王的祭司职权，以及这些职权与宗教礼仪、宇宙观念中的度量方式的联系才有可能，而进行这些度量时使用的标记主要就是线条、切口。

词源学的一个必需工作方法，是构拟那些历史上处于已被证实的形式和/或意义之前的形式和/或意义，也就是在已经证明属实的词位基础上，恢复其初始的、原初的形式和意义。特定词和构拟之间的时间间隔可能各不相同；不同词位、不同语言构拟的年代学特征也各不相同（很多词是 20 世纪的构词结果）。这种时间间隔的存在使得词源学分析结果只能是假设性质的，甚至在最严格遵守方法论各种要求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但这种使词源学同许多历史学科靠近的假设性质，并不减少辞源学成就的认知价值。

词源学与方言学紧密相关：方言数据对于解决许多标准语词的来源极其重要。如单词 сустав ‘关节’由动词 ставить ‘立放’构成，这可以 выставить（руку, ногу или палец）的方言用法‘使…脱臼’来加以证明。方言词汇保留着许多在标准语里消失的古代词位（试比较俄语方言词 багно ‘稀泥，沼泽’，навь ‘死人’，вир ‘漩涡’等其他的斯拉夫语言和印欧语系里都有对应词，但是未保留在俄语标准语中）。

词源学对于整个历史词汇学的发展，对于历史比较语法学都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后者，

词源学起着奠定基础的和新材料来源的作用，这些新材料可以证实已经判定的规律，揭示未被研究的语言史中的现象。由于词源学可深入到文字历史无法抵达的年代，它与考古学一起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重要工具。

词源学产生于古希腊（柏拉图《克拉底鲁篇》）。正是在这里出现了这个曾被归之于斯多葛派学者的术语本身。古希腊的词源学与关于语言中各种变化的规律性和语言的符号性质的科学观念格格不入。诠释的反历史性和任意性使词源学史的这个阶段与所谓民间词源学很相近，后者将词朝着与其他一些被想象为亲属词近似的方向改造（由于意义、或者形式、或者各种各样的联想义近似）（如认为 близорукий ‘近视的’ 产生于古俄语词 близо-зорькъ ‘近一视力’，试比较斯多葛派学者认为拉丁语词 crux ‘十字架’ 与 crus ‘脚’ 近似）。古希腊词源学原则一直到中世纪仍然保持着影响。科学的词源学是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同时诞生的。确定印欧诸语言的音素对应成分和作为历史比较语言学基础的相应语音规律，是对比这些语言的词位和提出这些语言亲属关系假说的结果，亦即词源学操作的结果。反之，语音和其他方面的规律、规律性又成为词源学的方法论基础。把词源学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理论阐述的第一人是 A. F. 波特（《印度日耳曼诸语言领域的词源学研究》第 1—2 卷，1833—36 年）。词源学历史的重要阶段有：承认方言价值和掌握语言地理学方法（J. 吉耶龙）；研究各种意义变化的特殊性和按语义场对词汇进行分析（J. 特里尔）；关注语义与现实事物的联系（提出在民族文化与历史的联系中研究词汇原则的“词与物”流派；R. 梅林格尔、W. 迈尔—吕布克、H. 舒哈特、W. 冯·瓦特堡）；转向词的原初形式与意义所经历的历史变化，即转向词的历史（将作为词的履历的词源学与将词源学理解为词的来源相对立；舒哈特、吉耶龙）。20 世纪词源学发展的显著特点是词源学研究中采用结构原则（按照语义、词根、词缀、词汇—语法等组群对词汇进行分析；顾及系统组织的对立、联想等各种原则；E. 本维尼斯特，Г. 雅可布逊，B. Ъ. 马尔蒂诺夫，A. C. 梅尔尼丘克）；努力构拟初始词（而不仅仅构拟词根），关注非常规语言变化，特别是由于每个词的历史独特性而造成的对词源学具有迫切意义的语言变化（V. 马赫克，S. 翁德鲁什和其他捷克斯洛伐克词源学学派的代表人物；然而在词源学中，承认非常规变化较之语音规律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概念，仍处于次要的地位——O. 谢梅列尼伊、Y. 马尔基耶尔、O. H. 特鲁巴乔夫）；探索词源学与语言学其他领域的相互关系问题，特别是比较语法以及词源学研究面向语法的问题（马尔基耶尔、F. 斯拉夫斯基）；深耕词源学研究的社会学方面，亦即词汇来源研究与社会历史及其精神、物质文化的联系方面（本维尼斯特、特鲁巴乔夫、B. H. 托波罗夫、B. B. 伊万诺夫、B. И. 阿巴耶夫）。

20 世纪下半叶的特点是拓宽词源学的研究范围，掌握新的方法论原则和新的词汇语料，这些都表现在大量词源词典的建构上。词源学作为一门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建构各种斯拉夫语言的词源词典，这些词典旨在构拟原始斯拉夫语词库，并将其词源学化（斯拉夫斯基，特鲁巴乔夫），它们成为原始斯拉夫语词汇学和词典学诞生的基础。

最重要的词源学词典有：

- В. И. 阿巴耶夫，奥塞梯语历史词源词典，1—3 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58—79；
- 保加利亚语词源词典，1—3 卷，索非亚，1962—86（继续出版中）；
- Г. А. 克利莫夫，卡特维尔诸语言词源词典，莫斯科，1964；
- В. И. 雷特金，Е. С. 古里亚耶夫，简明科米语词源词典，莫斯科，1970；
- Р. 阿哈里扬，亚美尼亚语基础词源词典，1—4 卷，埃里温，1971—79（亚美尼亚语）；
- В. М. 伊利奇—斯维蒂奇，诺斯特拉诸语言比较试编，[1—3 卷]，莫斯科，1971—1984；
- 斯拉夫诸语言词源词典，O. H. 特鲁巴乔夫主编，1—15 卷，莫斯科，1974—1988；
- Э. В. 谢沃尔吉扬，突厥诸语言词源词典，1—3 卷，莫斯科，1974—80（继续出版中）；

通古斯—满诸语言比较词典（词源词典材料），责任编辑 В. И. 清奇乌斯，1—2 卷，列宁格勒，1975—77；

B. H. 托波罗夫，普鲁士语。词典，[1—4 卷]，莫斯科，1975—1984（继续出版中）；

A. K. 沙基罗夫，阿迪格（切尔克斯）诸语言词源词典，1—2 卷，莫斯科，1977；

白俄罗斯语词源词典，B. Ё. 马尔蒂诺夫编，1—4 卷，明斯克，1978—88（继续出版中）；

乌克兰语词源词典，O. C. 梅尔尼丘克主编，1—2 卷，基辅，1982—85（继续出版中）；

M. 法斯梅尔，俄语词源词典，O. H. 特鲁巴乔夫译自德语并增补，第 2 版，1—4 卷，莫斯科，1986—87；

F. 米克洛西奇，斯拉夫语词源词典，华沙，1886，（阿姆斯特丹，再版，1970）；

G. 迈尔，阿尔巴尼亚语词源词典，斯特拉斯堡，1891；

W. 斯托克斯，A. 贝岑贝格尔，凯尔特语词典，第 4 版，哥廷根，1894；

H. 法尔克，A. 托尔普，日耳曼语词典，哥廷根，1909；

H. 法尔克，A. 托尔普，挪威语—丹麦语词源词典，1—2 卷，海德堡，1910—11；

W. 迈尔—吕布克，罗曼语词源词典，第 3 版，海德堡，1935；

E. 赫尔奎斯特，瑞典语词源词典，1—2 卷，隆德，1948；

O. 勃洛克，W. 瓦德堡，法语词源词典，第 2 版，巴黎，1950；

F. 斯拉夫斯基，波兰语词源词典，1—5 卷，克拉科夫，1952—77（继续出版中）；

W. W. 斯基特，英语词源词典，牛津，1953；

M. 迈尔霍费尔，简明古印度语词源词典，1—4 卷，海德堡，1956—80；

J. 波科尔尼，印度日尔曼语词源词典，1—2 卷，柏林—慕尼黑，1959—65；

H. 弗里斯克，希腊语词源词典，1—3 卷，海德堡，1954—72；

E. 弗伦克尔，立陶宛语词源词典，1—2 卷，海德堡—哥廷根，1955—65；

F. 克卢格，德语词源词典，第 19 版，柏林，1963；

A. 瓦尔德，拉丁语词源词典，1—3 卷，第 4 版，海德堡，1965；

V. 马赫克，捷克语词源词典，第 2 版，布拉格，1968；

M. 拉萨内恩，土耳其语词源词典试编，赫尔辛基，1969；

P. 斯科克，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语词源词典，1—4 卷，萨格勒布，1971—74；

斯洛伐克语词源词典。语法词和代词，F. 科佩奇尼，V. 沙乌尔，V. 波拉克编，1—4 卷，布拉格，1973—80；

原始斯拉夫语词典，斯拉夫斯基主编，1—5 卷，弗罗茨拉夫—[i. i.]，1974—84；

A. J. 范·温德肯斯，吐火罗语和其他印欧诸语言的对照，卷 1，卢万，1976；

F. 贝兹拉伊，斯洛文尼亚语词源词典，1—2 卷，卢布尔雅那，1976—82（继续出版中）；

J. 蒂施勒，赫梯语词源词典，1—2 卷，因斯布鲁克，1977—79（继续出版中）。

（许高渝 译）

Пизани В., Этимология, пер. с итал., М., 1956.

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в. 1—9, М., 1960—81 (изд.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Этимология (ежегодник), М., 1963—.

Malkiel Y., Etymological dictionaries. A tentative typology, Chi., 1976.

Etymologie, hrsg. von R. Schmitt, Darmstadt, 1977.

Pfister M., Einführung in die romanische Etymologie, Darmstadt, 1980.

Erhart A., Večerka R., Úvod do etymologie, Praha, [1981].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东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Восточные берберо-ливийские языки）

（作者：**A. Ю. 阿依汉瓦尔德** [A. Ю. Айхенвальд]；译者：**陈洁**，上海外国语大学）

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的东支，通行于利比亚和埃及。使用人口总数超过 30 万人。该分支内有西瓦语、奥吉拉语、福卡哈语、索克纳语、加达梅斯语以及利比亚内富萨的多种方言，这些方言根据语言的谱系分类属于**泽内特诸语言**，但其词法与东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相近。

辅音系统的特点是在一些语言中（西瓦语）没有擦音化齿塞音，在非重叠辅音位置时发生清化。元音系统的音位多于北支的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如加达梅斯语有 a, i, u, ä, ə, e, o）。奥吉拉语和加达梅斯语中保留有双唇擦音音位，这在许多情形下与图阿雷格语 h 相对应。内富萨语和奥吉拉语中有形容词有定范畴（有定的标志为前缀-a）；加达梅斯语和奥吉拉语中还保留有以-i-为标志的古旧的名词方位形式。作为否定语气词使用的是源于阿拉伯语的借词，或是派生的语气词。另一个特点是没有“否定”完成体。名词没有**状态范畴**（состояние）。在奥吉拉语中，状态动词保留着全部变位形式的聚合体。大多数语言以 tu-为标志的被动词基为非能产型，被动意义由标记 m-表示。

西瓦语和奥吉拉语中保留着特殊的综合形式被动态，标志为-i-。动词的关系形式没有词形变化（西瓦语中不存在动词关系形式）。语气词 d 用于构成某些类型的名词句。句中的词序为 VSO（如加达梅斯等语言），SVO（福卡哈语、西瓦语）。主从连接词通常源自阿拉伯语。词汇里有大量的阿拉伯语借词，也有源自意大利语的借词（利比亚东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中）。东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没有文字。

Motyliniski G. A. de Calassanti. Le dialecte bebère de R'edamèc, P., 1904.

Laoust E., Siwa. v.1, P., 1931.

Beguinet F., Il berbero nufŭsi di fassâto, 2 ed., Roma, 1942.

Paradisi U., Il berbero di Augila,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1960, No 35.

Его же, El fôgâha, oasi berberofona del Fezzân, Там же, 1961, No 36.

Lanfry J., Ghadamès, v.1—2, Fort-National, 1968—71.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东努米底亚语（Восточнонумидийский язык）

（作者：**A. Ю. 米里塔廖夫** [A. Ю. Милитарёв]；译者：**惠秀梅**，黑龙江大学）

又称努米底亚语、东利比亚语、利比亚语、马西尔语（Нумидийский, Восточноливийский, Ливийский, Массилийский язык），**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之一（在其中的发生学地位尚不清楚）。利比亚人（北非欧罗巴人种原住民的一部分）的碑铭语言。1631 年起古努米底亚境内（从突尼斯北部到阿尔及尔东北部）陆续发现的用**利比亚文字**书写的碑铭证明了该语言的存在。除了大量由单一语言书写的简短碑文和若干“纪念碑”规模的铭文外，特别突出的还有大约 20 个简短的拉丁语—利比亚语双语文献和两个在**解读**中起主要作用的大型**腓尼基（布匿）**—利比亚双语文献，其中的一个大型文献的镌刻日期被推定为公元前 140 年。

东努米底亚语**辅音系统**虽有尚未完全破解的空白，但已显示与大多数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的辅音系统相近；与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的两个清齿音（s 和 š）相对应是东努米底亚语的 3 个符号（其中之一可能表达硬腭化的 k）。无论是其**书写字形**，还是布匿和拉丁**字母转写**，都未指出 q 和 γ, t 和 d 的区别；布匿语字母 z 所转写的 3 个符号似分别表达 z, ž 和 ẓ（š 有一个单独的符号）。有喉音符号兼表词尾元音（参见替代元音 [Матреш лекционис]）。重叠的 ww 转写为符号 b: tbgg < *tawwagga — 杜加城，拉丁语为 Thugga（试比较卡比尔语中的 *ww > bb）。**专有名词**的拉丁字母转写显示有 5 个元音：a, i, u, e, o。碑铭中专有名词占多数，根据 O. 勒斯勒尔的理论，其中的一部分源于一些固定句。阴性专有名词的前后缀 t...-t 引人注目，这类词缀也可见于普通名词中，似乎像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那样，是构成

阴性名词的手段；阴性的另外一个标志后缀-t可能还用来构成抽象名词。复数由后缀-n构成。动名词中可区分出前缀m-及其变体n-（像所有柏柏尔—利比亚语那样，词中的唇辅音须**异化**）。勒斯勒尔区分出名词的3种状态（старыс）：不定状态（名词充当谓语、**同位语**，置于名词限定语前或与后附物主代词组合时充当被限定语）、有定状态（名词做专有名词的同位语，在属格语气词n前做被限定语）和指示状态。大多从与专有名词连用的动词中可区分出人称标志y-（阳性单数第三人称）、t-（阴性单数第三人称，单数，阴性）、-n（阳性复数第三人称）和派生词干（**词基**）的前缀s-（表示使役），可能还有t-（表示反身—被动），m/n-（表示伴随）和t-（构成表示持续、重复行为的惯常体，源自基本词基和派生词基）。多数动词的词序为VSO。

Долгопольский А. Б., Нумидийское (восточнолибийское) письмо Северной Африки, в сб.: Тайны древних письмен, М., 1976.

Chabot J. B., Recueil des inscriptions libyques, fasc. 1, P., 1940.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关切诸语言（Гуанчские языки）

（作者：A. Ю. 阿依汉瓦尔德[A. Ю. Айхенвальд]、A. Ю. 米里塔廖夫[A. Ю. Милитарёв]；译者：彭玉海，黑龙江大学）

加那利群岛土著人（他们一部分被欧洲殖民者消灭，另一部分看来已被其同化）的语言，近 18 世纪时已消亡。它们与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一起构成**亚非诸语言**的一个共同语族。关切诸语言保留在欧洲各国编年史作者记载中的有 1000 余个单词（主要是文化**术语**、**地理名称**（топонимы）、**人名**（антропонимы）和约 30 个尚未破解的语句，以及西班牙语现代加那利方言的**底层**（субстрат）词汇。

在关切诸语言的语音和局部恢复的**形态**（морфология）中，有许多与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尤其是与图阿雷格诸语言共同的特点，这可能是因为图阿雷格诸语言年代古老，或者图阿雷格—关切诸语言曾有过次生接触的缘故。据推测，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和关切诸语言的分化发生在公元前第三千年的利比亚沙漠地区，关切诸语言使用者从那里穿越撒哈拉迁向西非大西洋沿岸及更远的加那利群岛。

加那利群岛有 7 个岛屿的语言属关切诸语言，保存下来得最多的材料出自特内里费岛和大加那利岛，出自帕尔马岛、荷马岛、耶罗岛（费罗岛）、兰萨罗特岛（兰察罗特岛）、富埃特文图拉岛的材料较少。它们的内部切分不明晰，有许多共同的词汇，其中有的看来是从一些关切语引入另外一些关切语的借词。

关切诸语言的音位系统是在分析关切语词的各种**字母转写**（транслитерация）系统基础上重新恢复的，这些系统是欧洲各种不同语言的编年史作者所使用的，在恢复过程中还要考虑编年史作者记事时期本族语的语音变化（фон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并借助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的平行现象加以对照。关切诸语言的辅音系统和柏柏尔—利比亚语接近。保留着与图阿雷格语 h 相应的喉音 h；与柏柏尔—利比亚语的 r/qq 相对应的，看来是关切诸语言的“强势”小舌塞音 9/q，有时标记为轻音，有时标记为浊音。关切诸语言中同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的 z/ss, d/tt 相应的舌尖音，在标记上也有同样的两可情况，这表明关切诸语言“强势”辅音的轻/浊对立是无关紧要的。复原了的唇化音系列：h^w(?), h^w, k^w, 9^w/q^w, g^w。同在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中一样，重叠的 ww 产生(g)g^w。存在 k > č 的塞擦化情形；特内里费岛语的特点是 t/č 的交替。塞音 b 有擦音化变体。同柏柏尔—利比亚语的 f 相对应的是关切诸语言的 f 和比较少见的 p。重构的元音系统是 a, i, u, e, o, ə。音节结构是 V, VC, CV, CVC；首音中有为数不多的辅音丛（стечение согласных）情况。

名词的形态特点是有起源于柏柏尔—利比亚—关切共同语的构形成分，这里指前缀：a-

——也许是词汇化阶段中原来的冠词（试比较 *idafe—aidafe*），*ta-(<*tə-?)*，*tə-*，*ma-*；前后缀：*ta-...-ta/e*，*te/i...-te* ——看来是单数和阴性的标志，*ta-...-a/en*，*ti-...-an*，*ti-...-t-an*，*a-/i-...en*，*a-...-t-an* 等构成复数形式或集合名词、物质名称。还有带后缀 *-t*，*-te/a* 的名词，例如 *bano-t*，*farau-te*。也可借助中缀 *-ay-* 来构成指小形式（*дими́ну́тив*）（例如 *ara* ‘山羊’，*hara* ‘羊，绵羊’，*jaira* ‘小山羊’）。少数保存下来的形容词与柏柏尔—利比亚语言的模式相应。区分出复数第一人称物主代词 *-ka*（*mai-ca* ‘我们的母亲’）、单数第二人称阳性物主代词 *-t*（*zahana-t* ‘你的仆从’）以及与柏柏尔—利比亚语的 **(ə)s* 相应的单数第三人称阳性物主代词 *-s*（*ati-s* ‘他的父亲’）；还有相应于柏柏尔—利比亚语 **-i* 的单数第一人称客体代词 *-e*。保存下来两套数词，估计源于大加那利亚和特内里费岛，大部分同柏柏尔—利比亚语的数词相吻合。

动词中初步区分出元音后的第一人称单数形式标志 *-ca* 和辅音后的第一人称单数形式标志 *-əc*（*<*-ka/*-ək* 或 *<*-qa/*-əq*）；单数第二人称 *-ca*（*<*-ka?*），单数第三人称 *-y*；试比较相应的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的单数第一人称标志 **-ay*，单数第三人称标志 **y/i-* [但不是单数第二人称标志，这里和单数第二人称标志形式上相吻合的是关切诸语言中的单数第二人称客体代词 **-(i)k*]。

句法特点是，关系句紧缩为一个词形的情况十分常见。有通过同位联系构成的复合词或词组；成分的位置不固定。领属结构中属事名称先于领事名称；句法联系标记是将属事与领事连接起来的成分（*nota genitivin*）。在一些可加以分析的动词句子中，谓语位于句首。

关切诸语言中最普遍的是三个和两个辅音构成的词根；常见复合词和名称一句。有源自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的借词（包括来自阿哈加尔之类的图阿雷格诸语言），还有的借自阿拉伯语（像是经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转借）、埃及语及其他非洲语言（豪萨语、东库施特诸语言）。

关切诸语言无文字。存留下来一些利比亚文字的岩刻铭文，A. Ю. 米利塔廖夫认为系操图阿雷格语的移民于第一千年末期（见图下方的**破解**）所为。关切诸语言自 18 世纪起开始研究。20 世纪时，J. 阿伯克龙比和 D. 韦尔费尔认为关切诸语言可能属于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但这一观点受到不少柏柏尔学家，首先是 A. 巴塞的质疑，他指出了许多对比不确切的问题。最杰出的关切诸语言研究者，不论在零散材料的编目方面，还是在材料的语言学分析方面，都当首推韦尔费尔。位于哈莱因（奥地利）的韦尔费尔加那利研究所从事关切人及岩刻铭文的研究。西班牙和加那利群岛也在对关切诸语言进行研究。

加那利群岛（耶罗岛）岩刻铭文利比亚文字举例图从略。

铭文的字母转写、阅读和翻译		
铭文 1		
(A) → (B)	ymrn [y-əmmər-an]	路过的
(C) → (D)	ynmss dl [i n mess ədəl]	（任何一个）来自上帝的人，来投宿吧
铭文 2		
(A) → (B)	yssn yn [y-əssən yən]	有一个人知道
(C)	n	的
(D) → (E)	mhrs n [i-mâ-drâs-ən]	不多人中
铭文 3		
(A) → (B)	wr dl [ur ədəl]	别要
(C) → (D)	tdnt [tâ-dən-nt]	油
(E) → (F)	nmr [an-imir]	更多
铭文 4		

(A) → (B)	nn mryn [ənnən emir-yən]	有时读一下吧
(C) → (D)		
(E) → (F)		

Wolfel D., Monumenta linguae canariae, Graz, 1965.

Cubillo Ferreira A., El idioma guanche del archipiélago africano de Canarias y su pertenencia al area berber, La Cuesta, 1983.

Kanarische Studien, Bd 1, Hallein, 1986.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卡比尔语 (Кабильский язык)

(作者: A. Ю. 阿依汉瓦尔德 [A. Ю. Айхенвальд]; 译者: 易绵竹,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之一, 通行于阿尔及利亚北部山区, 使用人口约 260 万。区分为大卡比利亚方言和小卡比利亚方言。

辅音系统的特点是塞音在非叠音位上的擦音化、硬顎化和塞擦音化, 有圆唇软顎辅音(伊尔任方言 (irjen))。元音音位有 a, i, u, ə。名词有状态范畴, 形容词有不定范畴。状态动词保留着完整的变位聚合体。存在非现实式意义的强化完成体形式。关系形式没有词形变化。

否定语气词由两个成分构成, 名词否定用借自阿拉伯语的语气词表示。“客体列”代词通常用来充当不及物谓词的主体。使用名词句标志 d。句子词序为 VSO, 句子从属关系欠发达。词汇中有许多阿拉伯语词。20 世纪 80 年代在拉丁字母的基础上创立了文字。

Basset R., Manuel de langue kabyle, P., 1887.

Picard A., Textes berbères dans le parler des Irjen, t. 1—2, Alger, 1958.

Vincennes L. de, Dallet J., Initiation à la langue berbère (Kabylie), v. 1—2, Fort-National, 1960.

Chaker S., Un parler berbère d'Algérie (Kabylie). Syntaxe, Lille, 1983 (Diss.).

Dallet J.-M., Dictionnaire Kabyle-Français, Algérie — P., 1982.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类推 (Аналогия)

(作者: E. C. 库布里亚科娃 [E. C. Кубрякова]; 译者: 陈勇,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从形式和/或语义上将一个语言单位与另一个语言单位进行类比的过程, 或者是将存在于一对(组)单位中的关系向另一对(组)单位迁移的过程。运用类推意味着在言语活动中运用结构范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若干新的单位。纳入类推过程的可以是各个层级、各种长度、各种结构等的单位。在使任何模式、规则等普遍化并推广到新的单位时, 类推的作用都会表现出来。类推的先决条件是有范例作为模仿和再现的依据: 比如, 以“стол : столы”(桌子[单数]: 桌子[复数])或“дом : домик”(房子: 房子[指小形式])之类的比为基础, 可以构建“столб : столбы”(柱子[单数] : 柱子[复数])或“кот : котик”(公猫 : 公猫[指小形式])及其他类似的比, 也就是说, 以类推为基础按照“比例方程”求解原则来构建比例式: “стол : столы = x : столбы”或者“столбы : x”, 等等。因此, 类推的内部机制体现为按照上述公式寻求(计算)比例式中的第 4 个所求值(未知数)。形态学分析法正是以这一原则为基础, 该方法在俄罗斯语言学(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界与 Ф. Ф. 福尔图纳多夫、A. M. 佩什科夫斯基等学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在国外语言学界则与 J. H. 格林伯格所谓的方格(square)理论相联系(ac : bc = ad : bd)。

类推是语言发展和应用的一种重要因素, 它使说话人轻松地用已知的形式部分创建新的形式(由于已知形式的新的组合、遵循特定的模式和图式等)。

类推体现在语言结构的所有层面，对于童年时期掌握母语、母语自然运用、教授外语以及总体而言对于培养稳定的言语技能，都具有奠定基础的意义。类推活动尤其鲜明地体现在儿童言语中，这里类推是掌握语言的基本手段；通常掌握了某种结构或构式后，幼儿会随之将其构成方法的认识扩展到该类别的所有单位上，*поросенки*（错误的复数形式——译者注）、*плакаешь*（错误的变位形式——译者注）之类违背约定俗成原则的形式由此而来。根据类推构形广泛见于方言和俗语中。

就性质和影响而言，类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类推因能将规则泛化，可作为组织和理顺因素发挥作用（试比较：系统压力[*давление системы*]、聚合抹平[*выравнивание*]概念等），是语言系统化的工具。在这方面，类推通过大规模地再现、重复某些范例而扩充了正确的、合乎规则的形式列。另一方面，通过促进对偏离该模式形式的改造，类推可能已经不是作为维持、守旧的因素，而是作为改造的因素发挥作用，构造新的形式列。这样一来，类推既是复制活动的基础，也是生产、创造活动的基础，既可以是规则形式的来源，也可以是非规则或仿造形式的来源（试比较方言 *пеку* [动词 *печь* 单数第一人称的标准语变位形式——译者注]：*пекёшь* [动词 *печь* 单数第二人称的方言变位形式，其标准语形式应为 *печешь*——译者注]、*ехай* [动词 *ехать* 的标准语命令式应用 *поезжай* 形式——译者注]等；也可比较俄罗斯标准语中 *махать*：*махаю* [动词 *махать* 单数第一人称的口语变位形式——译者注]和 *машу* [动词 *махать* 单数第一人称的通用变位形式——译者注]）并存的情况。由此产生对类推及其在语言变化和发展中的功用的不同理解：或者将它视为一种规则化的因素，或者相反，将它视为产生各种创新、偏离、例外甚至异常现象的手段。

对类推的辩证理解源于古希腊罗马语法学家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类推与“异常”这一概念相对立，两者反映了关于“语言多大程度上是规则性的”这一问题的极端观点。能用类推解释的形式被认为体现了意义与其表达形式相称，是规则的形式，而偏离这些形式并且没有体现上述特征的形式则被视为是异常的（希腊语 *anômalia* [不一致]）。类推论者在语言中寻找合乎规则的形式分类范例，并将**聚合体**、范例概念引入学界；异常论者则指出语言中存在大量无法用类推论加以解释的形式，他们将**同音关系**、**同义关系**及其他一些现象视为各种类型的异常现象。但是因为语言中的非规则性只有在规则性的背景下才能被发现，所以何为规则及其例外这一问题，仍然是语言学中一个现实的问题。

对类推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是青年语法学派的学者（见**青年语法学派**），他们提出了**语音规律**作用无例外的主张，但随后不得不为了解释被发现的一些偏离问题而引入两种现象：类推和借用。青年语法学家的著作指出，在语言发展和应用的过程中，类推如同音素变换一样具有规律性。F. de 索绪尔考察了类推在**词形变化**和**构词**中的作用，提出了类推取决于形式的切分和分解的思想，同时也强调了类推机制的心理学基础及与之相关的人在言语活动中的创造因素。

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А. А.,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 2 изд., М., 1967.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Морфология и синтаксис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под ред. М. В. Панова, М. 1968, гл. 6.

Блумфилд Л., Язык, пер. с англ., М., 1968.

Соссюр Ф. де. Труды по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пер. с франц., М., 1977.

Лайонз Дж., 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оретическую лингвистику, пер. с англ., М., 1978.

Кубрякова Е. С.,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б аналогии, в кн.: Сущность, развитие и функции языка, М., 1987.

Plank F., Morphologische (Ir-) Regularitäten. Aspekte der Wortstrukturtheorie, Tübingen, 1981 (лит.).

（田文琪、张家骅 审校）

历史比较语言学（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作者：B. H. 托波罗夫 [B. H. Топоров]；译者：孙淑芳，黑龙江大学）

以亲属语言，亦即在发生学上有联系的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领域。历史比较语言学具体应确定亲属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描写这些语言的时空演化；历史比较语言学使用的基本研究手段是**历史比较法**；最普遍的研究形式是历史比较语法（首先涵盖语音学）和词源词典（词汇学）。

历史比较语言学与描写语言学或称共时语言学、规范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相对立。但同时历史比较语言学既和描写语言学，又和普通语言学相关联，在许许多多问题上相互影响。

由于对 18 世纪下半叶到 19 世纪最初的几十年，在欧洲科学—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普遍思想—精神语境的作用估计不足，人们通常把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首先是其核心——历史比较语法的产生，与 18 世纪末欧洲语言学家认识**梵语**联系在一起。此前，自然科学（首先）积累了大量的具体材料，为第一次共相分类和**分类学**（таксономия）奠定了基础，为考察整体、确定其组成部分的等级、假设等级本身就是某些普遍规律作用的结果提供了可能。整个这一阶段的工作意味着对事实进行经验主义的比较研究的重要作用，从而不可避免地得出一个结论，即外部多种多样事实的背后必然隐藏着（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给予解释的内部统一性。历史主义成为当时世俗化的科学的解释原则，历史主义承认时间发展是以自然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将普遍安排现实化的神的意志）进行的，是按照既描写一些物种与其他物种更迭本身，又描写它们所接纳的具体物种的规律实现的。由此出现了解释事实的新观点：倾向于不将事实视为“物种（“生物”——存在于生物学中）的阶梯”，而是以物种自然变化为前提的“发展链”。通过物种的历史来加以解释的物种可变性（完整的思想形成于 19 世纪中叶之前，参见 Ch.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成为物种多样性的原因。发展本身被设想为两种情况：较常见的是由简单到复杂和优化的上升线（试比较大量的进化论，从 A. R. J. 杜阁、F. D. 莱辛、J. G. 赫尔德、M. J. A. N. 孔多塞到 J. B. 拉马克、E. G. 圣—蒂莱尔以及达尔文等），较少见的是与退化有关的下降线（J. J. 卢梭、J. 默泽尔等）。类似观点的反映林林总总，而且常常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系在一起。因此，一方面，出现一些力求全面、完整描写历史的各别尝试（D. 休谟或 E. 吉本），肯定历史作为独立学科的观点（杜阁、百科全书派学者、I. 康德的《通史思想》[1784]），形成泛哲学的发展理论，特别关注发展的原因和阶段以及“逻辑”和“历史”的相互关系（G. W. F. 黑格尔、F. W. J. 谢林等）。另一方面，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比较学科（比较解剖学、比较胚胎学、比较古生物学、比较地理学等），发展了自然科学“历史比较主义”的普遍和具体原则（拉马克、圣—蒂莱尔、G. 居维叶、Ch. 赖尔等）。最具代表性的是，形式（而不是功能）成为历史变化和科学比较的对象，这为**形态学**地位上升、赋予研究对象结构中的同源概念（即不是功能上的相似，而是形式上的，具有共同起源的相似）以重要意义，提供了先决条件。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对历史比较语言学同样重要，然而它们并没有得到公认，如确定整体各部件相互作用的系统概念（这个概念还常用术语“机体”表示）的形成（试比较居维叶的严格决定论观点），初始的原型模式（R. 欧文）思想的提出，这一原型模式可解释所有已被现实验证的具体类型的发展）。

语言科学不仅经受了来自普遍**方法论**卓有成效的影响，而且自身也积极参与许多总体思想的构建。其中，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1770，1772 版）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这部专著连同其论文“论语言的年龄”是迈向未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最重要通道之一。赫尔德反对当时流行的语言自古已然、由神起源、恒常不变的论题，是语言学历史主义的昭示者之一。根据他的学说，自然规律决定语言产生和继后发展的必然性；语言在起源上与文化（包括诗歌）密切相关，与社会一样，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语言与文化和社会的不可分割联系使其成为民族精神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列举语言变化众多原因的工作在很多方面超前于自然科学的类似问题，如 A. 洪堡特的生物地理学）。19 世纪初，J. C. 阿德隆就语言历史发

展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制定了区分语言亲属关系程度的标准，这些标准不是简单地以比较认为有亲属的语言为前提，实质上比较的是亲属语言的**语法结构**（不仅是词位！）。具有代表性的是，W. 琼斯通过结识梵语，发现了梵语与希腊语、拉丁语、哥特语及其他语言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上具有相似性，在 1786 年他就已经提出了全新的语言亲属关系观：只有在所比较的语言中有足够数量的类似共同点时，才可以得出它们在发生学上有亲属关系，因而起源于共同**原始语**的结论。F. 施列格尔的《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1808）不仅强调语法成分在确定语言亲属关系时的作用（正是他提出了使用术语“比较语法”），而且针对梵语、波斯语、希腊语、德语和其他语言，提出印欧诸语言历史比较语法最早的一批公设，强调指出变位形式的独特方法论实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这些理论前提通过对比类型的各种词典（《世界语言与方言比较词典》，П. С. 帕拉斯，1787—89，1790—91 第二版；西班牙传教士洛伦索·赫尔伐斯—伊—潘杜罗编撰的词典，1784，1800—05 年第二版；J. C. 阿德隆和 J. S. 法特的《语言大全或普通语言学》）对广泛收集的各种语言词汇进行系统整理而得以充实，这些词典为亲属语言的词汇划分（尽管是非常初步的、近似的划分）创造了特别有利的条件（参见**语言亲属关系、语言谱系分类**）。

语言亲属关系的思想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试比较：A. 但丁著述中的部分思想，再如吉约姆·波斯特尔的《论语言亲属关系》，16 世纪）。有些著作因作者把内容限定在有相似关系的语言范围之内而很有特色，如《论欧洲语言》，J. J. 斯卡利杰尔，1599 年。但这部著作纳入比较的不仅是后来被承认为印欧语系的语言，而且还纳入了芬兰语、匈牙利语和巴斯克语，这些语言使得若干本来无可争议的结论变得似是而非了。G. W. 莱布尼茨对旧大陆亲属语言曾经提出更加宽泛的分类建议，实际上把印欧语（他称为“凯尔特语”）和乌拉尔—阿尔泰诸语（“斯基泰语”）区分开来。对于未来历史比较研究更加有高瞻远瞩意义的是那些把研究任务确定得比较狭窄的著作（比如证明各别语支或语系的亲属关系，为此任务定位在相似因素的比较上）。在这方面，17 世纪已形成了对闪米特语系（E. 基沙尔、J. 鲁道夫等），日耳曼语族（L. ten 克特）、罗曼语族（François Just Marie 雷努阿尔）、斯拉夫诸语言（J. 克里扎尼奇等）及其他语言之间（等）的亲属关系的认识。具有特殊意义的是 Ph. J. 冯·斯特罗伦贝尔格 1730 年出版的北欧、北高加索诸语言比较图表，正是借助于这部图集建立起来乌拉尔和阿尔泰诸语言的分类（芬兰—乌戈尔和萨莫耶德诸语言；突厥、蒙古、通古斯诸语言），尽管还只是一个雏形。这些语言分类的初步尝试促进了各种早期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案的构建，而这些方案的构建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类的初步尝试。

19 世纪 10 年代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思想体现在，采取相应技术手段的历史比较性质的研究大多建立在印欧语言材料的基础之上，由此，这些语言的历史比较语法便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主导学科，该学科推动了其他语言历史比较语法的发展。

历史比较语言学导致建立历史比较语法那场革命的主要人物是 F. 葆朴（《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比较的梵语变位系统》，1816）、R. C. 拉斯克（《古代北方语言研究》，1818）、J. 格里姆（《德语语法》，1—4 卷，1819—37 年，论述的是日耳曼语）和 W. 洪堡特（《语言在其不同发展时期的比较研究》[1820]等）。洪堡特在理论上为历史比较语言学既特殊又独立的语言学学科地位奠定了基础，但这门学科诸多结论的头等重要意义却表现在文化、心智活动、民族心理的研究方面。洪堡特的功绩是，他将语言学凸显出来，使之成为历史学系列的一门新学科——“比较人类学”。这样一来，他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任务作了异常宽泛的理解：“……语言，透过语言才能够懂得的人的一般目标、逐步发展的人类、各自独立的民族，这 4 种相互关联的客体恰恰应该成为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洪堡特在高度关注**内部形式**、音义联系、语言类型学等历史比较语言学关键问题时，与很多历史比较语言学领域的专家不同，在语言的历史研究方面也强调与创造精神和就广义而言的意义范畴的联系（语言和思维）。因而，语言学的历史主义远远超出了历史比较语法的框架。在语言科

学领域归功于葆朴的是，他创建了首部印欧语历史比较语法（1833—49），从而开启了同类的大语系语法著作系列的先河；制定了诸亲属语言中形式的序列比较法；尝试对亲属语言现象本身加以阐释。葆朴关注**梵语**具有特殊的意义，梵语在时空方面距离欧洲语言十分遥远，自身历史上与欧洲语言没有接触，不仅如此，还十分完整地保留了古老的状态。拉斯克的贡献在于，他制定了对应语法形式的分析方法，将语言间亲属关系的不同程度显示出来。根据相近程度区分亲属关系成为构建亲属语言历史发展图式的必备前提。这种图式由格里姆倡导，他系统考察了日耳曼诸语言的3个发展阶段（古代、中古和近代），从哥特语到现代英语。自格里姆开始，语言组群特别是单个语言的“历史语法”概念成为语言学中的现实（但与格里姆的尝试不同的是，“比较”的部分在这些历史语法中往往退居次要位置或隐含其中）。这样一来，到19世纪30至40年代，历史比较语言学在语言学领域中为自己争得了一席稳固之地，并对语言学的其他领域产生重要影响。这一时期历史比较语言学及其原则、方法和研究技术逐渐成形。

历史比较语言学至少从19世纪20—30年代明确地定位于“比较”和“历史”两个因素（就这方面而言，俄语语言学术语体系中该学科的名称一目了然），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很清楚（在实际操作中对它们的解释各不相同）。有时强调“历史”因素：这个因素决定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目的（语言史，其中也包括文字产生之前的时代、方向和各种原则（历史主义），这种情况下的“历史”因素完全符合赫尔德—施列格尔—格里姆—洪堡特整条脉络的思想。如果对“历史”因素的作用作这样理解的话，那么另一因素，亦即“比较”因素，毋宁说决定着研究手段，借以实现对某一种语言或某些语言进行历史研究的目的。就这一意义而言，“具体语言历史”体裁的研究是有典型特点的，外部比较（与亲属语言的比较）这时在实际上可以不存在的，即仿佛对待该语言发展的史前时期那样，取而代之的是对较早期与较晚期的语言事实、一种方言与另一方言或者语言的规范形式等等的内部比较。但是即便这种内部比较，也常常是隐约的，被降低为仅仅以服务于判断语言历史进化为目的的技术手段（比较方面本身，即被对比成分的相互关系失去了本身的自足性）。其他研究者的著作强调的重点恰恰是**比较**，以被比较成分本身的相互关系为关注中心，关系似成为主要研究对象，而通过这种比较得出的历史结论则未被强调，不加阐释，搁置起来待以后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比较不仅是手段，而且还是目的；正因为如此，比较可能根本不必进行阐释，很多语言组群的比较语法都属于这种类型，A. 梅耶所提出的亲属语言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印欧语言比较语法主要内容的观点，就是“为比较而比较”的最鲜明的例子，但不应由此而认为，这样的比较对于语言历史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蕴涵可言。比较往往具有可阐释性（如这样一些比较结果：设定原始语或称基础语、确立所比较语言之间的历史相互关系以及它们的方言划分、相对年代顺序或不同类型的构拟，这些比较的结果都可能使该语言或该组群亲属语言的历史延长，或者使它们的历史变得更加丰富和更加具有可区别性）。根据以上所描写的“历史”和“比较”相互关系的两种情况，常常区分历史语言（语法）学和比较语言（语法）学，这样做使得“历史”和“比较”之间的分界线多少变得含糊一些，大略地将它们分成不同的方面，藉此而部分地掩盖了当这两种因素相互支撑、相互加强时出现的那些恰恰是最显著、理论上最重要的状况。

如果说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逻辑结构中，“历史”和“比较”的相互关系足够清楚，而且前者的主导地位不会引起特别的怀疑，那么显示历史比较语言学特点的探试结构的核心依然是“比较”，比较作为一种从属变量，在地位上恰恰“从属”于对其而言的初始概念**亲属关系**。因此，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本公设之一（尽管一般未加描述），就是验证语言材料可进行比较操作的必然性，换言之，即证明该语言材料属于亲属语言的必然性。但语言的亲属关系本身只能通过定位于历史的相互比较来确定。这个逻辑怪圈（*ignotum per ignotum* [以未知解释未知]悖论）在描写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逻辑结构、对不完全确信有亲属关系的比较因

素进行实际操作时，不能不加以考虑。历史比较语言学，尤其是历史比较语法学，要走出这一怪圈，就要连续采取尝试错误法，亦即首先立足于或多或少的外部特征，然后凭借乍看并不显眼，但在研究过程中逐步被发现的内部事实。这种对比尝试可能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对比被比较所代替，要比较的事实数量激增，在此基础上出现可能形成对应成分系统抑或甚至构拟原始语，以证明先验的语言亲属关系的来源和原因），也可能失败（被对比成分具有亲属关系的初始假说未被进一步的对比证实，先前假设的各种对应成分被定性为巧合）。依据这个操作结果来解决上述语言事实能否成为历史比较研究对象的一般问题。语言事实在第一种情况下归属历史比较语法，在第二种情况下则纳入对比语法（参见**对比语言学，对比法**）。与语言学其他分支不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对象是发展角度的语言，亦即直接与时间或语言的时间形式变换相关的那种变化方面（如空间，中心地域（**диалектный ареал, focal area**），该地域的语言差异可以理解为表示各种时间差异的空间形式）；在这一意义上，时间上的变化与其他原因（职业、年龄、性别、体裁、修辞、偶因、病理等）导致的语言变化没有直接联系。更确切地说，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对象是语言中那些由时间的作用所决定的东西，而且只是在这些东西由于其时间变化足以反映时间运动的条件下。因此，对历史比较语言学而言，语言重要在它是时间的量度（“语言”的时间），而时间可以用语言（用不同的语言成分），而且每一次以不同的方式）来度量这一事实与时间表达形式的广泛问题有着直接关系。基于对历史比较语言学对象的这一理解，有理由引入“语言”时间的最小量度，亦即语言变化的量子区，语言状态 A_1 偏离语言状态 A_2 的度量单位，如果 A_1 和 A_2 在时间上相邻（假定如果没有语言变化，哪怕是“零”变化时，“语言”时间就停止下来）。任何能记录语言时间变化的**语言单位**（**音位、词素、词**〔词位〕、句法构式）都可以充当语言变化量子区。但在历史比较语言学，尤其历史比较语法的实际发展中，音素（而后是音位）这样的语言单位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它们按照其最小的移动（“脚步”）（ $x > y$ 音）依次排成一列列历史的延续链条（如 $a_1 > a_2 > a_3 \dots > a_n$ ，其中 a_1 是构拟成分中时间最早的成分，而 a_n 是时间最近的成分，即现代成分，形成音素对应矩阵（如 A 语言中 x 音素与 B 语言中的 y 音素对应、C 语言中的 z 音素等对应之类）；随着音位学的发展，尤其是在音位学分出音位区别特征层次时，关注语言变化的区别特征这一更细小的量子区，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如 $d > t$ 的变动被解释为不是一个音位的变动，而是更小的一个区别性特征的变动：浊音 $>$ 清音）。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音位是能够记录区别特征构造的时间变动的最小语言片段（空间）。这种状况可以用来解释历史比较语言学更加突出地体现为历史比较语法的这一主要特点。尽管如上所述，最小变动记录在音素（或词素）层面上，被描写为“某一语言中 x 音素与另一语言（亲属语言）中的 y 音素一致”，但音素（或音位）比较的（最小的，足够的）对比空间是**词素**（表达对应关系的显著性形式最好应该是：A 语言词素 K 中的音位 x 与 B 语言词素 K_1 中的音位 y 相对应，同时 K 和 K_1 为体现共同来源的亲属词素，共同来源在时间上先于其后来出现的各种体现形式）。因此，词素曾经注定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中，特别是在历史比较方法的发展中（尽管前一段时间这种作用没有被足够清晰地认识到）发挥非常独特的作用。如果类似“A 语言中 x 音素与 B 语言中 y 音素对应”的判断了无新意（在缺少特殊条件的情况下），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框架中没有可操作性（更加不可操作的是“A 语言中意义 m 与 B 语言中意义 n 对应”之类显得荒唐的论题，那么类似的词素（可以表示**语法范畴、词**（的）结构成分或者**词汇意义**载体〔根词素〕）对比就是最有效的，最具操作性的：这类对比不仅把比较指向最小项（音位）和最大项（词），而且简明扼要地指出记录被比较项亲属关系的成分。因此，特定语言（或组群语言）的词素成为构建该语言或组群语言的历史比较语音学、语法学的必要的和充分的基础（严格来说，仅限于“语法”词素就足够了）。语言的词素结构越清晰，对该语言的历史比较阐释就越完整，越可靠，该语言在其组群语言的历史比较语法中的贡献也就越大。

从历史比较语言学逻辑结构的上述特点不仅可推导出其诸多优点（其中有：如果已知所比较的词素有亲属关系，则操作过程相对简单；构拟非常便捷、甚至被比较成分已经部分体现的情况也不少见；可以在相对年代顺序学方面整理单个或若干个现象的发展阶段；形式优越于功能，因为形式常常比功能更加稳定和可靠等），而且也可推导出其不足或者局限，这涉及到历史比较语言学使用的方法。不足或局限主要与“语言”时间因素相关联：用来进行比较的语言可能与起始基础语或者与其有亲属关系的另外一种语言在“语言”时间距离上相去甚远，以致大部分继承下来的语言成分（理论上是所有成分）都已丧失（被时间磨灭），因而该语言自身被比较淘汰出局或者成为比较的不可靠材料；局限性的另一面是，无法构拟那些古老程度超出语言记录“语言”时间的能力的现象，即超越该语言的时间长度极限。另一些情况是，一种语言与其亲属语言或原始语分离开来的“语言”时间很长，虽然用做比较的材料（如词素）保留了下来，但这些材料因变化很大，因而已经十分不可靠，尤其是可以作一系列各种不同的历史比较阐释。最后，语言中的借词可能是特殊复杂的所在。借词的数量过于庞大（已知有些语言，其中的借词数量超过固有词）可能实质性地改变对“自己的词”和“他人的词”相互关系的认识，并为“虚假”的、但规律性程度又很高的对应系列提供根据。在没有外部证据的情况下，借词通常从内部，通过语言学的方式来加以确定，根据的恰好是偏离在该语言或该族群语言中起作用的对应成分图式。但是古老的外来词可能丧失“外来”的语音记号，被完全同化。这种掺杂成分可能歪曲全部图景，况且研究者并没有办法来确定这个词是外来词还是固有词，因而正确地或者错误地把它拿来比较。“未加权衡”的比较包括各种复杂情况的特殊类型，如充当对应系列的成员的属于同一语言的两个或多个存在状态（而研究者认为这里说的是不同语言），或者相反，由于材料不可靠，比较序列中的一个成员是空位。被“命运捉弄”的例子并不少见（尤其是在事实不足的情况下），会出现现实中无与对应的幻觉事实，或者是“被移动了”的，仿佛蓄意使然的，事情真相在某种程度上遭到歪曲、掩盖的事实。鉴于这些情况，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不能单单依靠规定的程序；人们常常发现，需解决的任务属于特例，要求助于非标准的分析方法，或者解决成功仅有一定程度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由于确定了诸亲属语言的相应成分之间的对应图式和该语言的诸成分之间的时间承继图式（即 $a_1 > a_2 > \dots a_n$ ），历史比较语言学获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与描写性和/或规定性之类的传统学科对立，历史比较语言学是一门解释性学科。在这方面，历史比较语言学与自然科学相似。在这两种情况下，反映在相应描写中的经验数据都需要从原因上加以解释；正是原则上确立了因果关系，这些学科中被研究对象的历史发展才得到了解释。历史比较语言学中“历史”因果原则以及严格方法论（所谓“数学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提出了语音规律概念（参见**语音规律**）。语音学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中的角色与在描写语言学中截然不同：如果在后者中语音学只是一门辅助学科，音素如同字母一样，只是被解释为表达手段的话，那么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中语音学则成为其主导部分，这尤其因为在语音中历史变化过程展现得最充分、最客观，这种变化过程不像其他层面那样遭到来自说话人可意识到的内容成分的修正。早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满足于承认对应现象，但对对应现象的规律性和严格性的坚持没有达到通常自然科学所认可的那种程度。不管怎么说，还是有人推测，可能有一种什么东西比语言规律更加深刻地在影响着语言（葆朴）。但坚持自然科学思想、视语言为自然机体的 A. 施莱歇尔已经试图将语言规律作为自然规律的体现了。施莱歇尔恐怕是致力于不仅查明作用于某个语言范围内的具体语音规律，而且查明语言共性（普遍）规律的第一人。施莱歇尔的印欧原始语构拟实际上已经把语言规律至高无上作为前提条件了。但施莱歇尔对这些规律的解释本身并未能被下一代比较语言学家所接受，尽管相信语音规律极端重要是 19 世纪 70—80 年代历史比较语言学青年语法学派的共同主张（参见**青年语法学派**）。与此相应地，对历史比较语法中那些不立足于规律，而立足于例外的全部判断都不与苟同的态

度发展起来。1878年H. 奥斯特霍夫和K. 布鲁格曼在《形态学研究》中提出了语音规律守恒原则，这一原则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中起到了它当之无愧的杰出作用（参见**格里姆定律**、**维尔纳定律**、**格拉斯曼定律**、**福尔图纳托夫—索绪尔定律**、**布鲁格曼定律**、**西弗斯—埃杰顿定律**）。有些只是后来才被证实的预言一定律具有重大的方法论价值，试比较索绪尔构拟的“响音系数”，如后来E. 库里洛维奇所指出，反映在赫梯语的h上；再如F. C. 迪茨的罗曼语构拟和拉丁语口语变体材料的证实。对语音规律守恒观点表述的绝对性和极端性后来引起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为理解规律起作用的条件补充了很多新的思想。首先要求对那些无法从特定语音规律推导出来的，看起来是例外的语言事实作出解释。对语言规律作用的偏离现象作普遍解释的首次尝试是引用**类推**（аналогия）原理，关于类推的心理学理论在H. 保罗的《语言史原理》（1880）中已有所表述。许多印欧诸语言历史比较语法中具体的例外现象（部分是其他语系的）都程度不同地得到了成功的解释。尝试使用作为语言发展重要因素的类推原理导致了两个重要结论：首先，类推作用本身是语言系统诸成员与这些成员自己的特殊层级之间存在相互关系的结果，这一层级决定了类推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关注系统本身及其应用原则比指出类推更重要）；其次，类推（甚至当关注其植根于语言系统的原始机制时）还是完全无法解释很多语言事实，或者即便解释了，也不尽人意。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在就整体而言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中，还是在具体的语言或族群语言历史比较语法中，抑或在语音规律作用范围理解本身等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的是那些数量众多、实质上种类不同、其内部往往未协调一致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理通过分析语言发展的空间形式来加以检验。原始语的公设，如同关于过渡基础语、原始语的切分及其个别分支之间的主要联系等假说一样，严格地说，本身都掩盖了一个对这些纯语言构造进行时空阐释的不可回避问题。J. 施密特的“波浪”理论（1871）针对施莱歇尔的“谱系树”理论，予以富于雄辩的尖锐批驳，“谱系树”理论只是记载了语言分解阶段的先后次序，不但忽视了原始语及其后续诸继承语的空间定位问题，而且也忽视了多边语言联系的全部复杂情况。“波浪”理论实际上是率先定义亲属语言空间相互关系的一个方案，主要用空间因素（即语言空间存在的方式）来解释语言的特殊情况，包括那些看起来例外的情形。语音规律和语言及其亲属关系的空间角度这两个题目的关联性在H. 舒哈特的著作中说明得最清楚，他反对语音规律不容置疑的主张，但使用的解释都出自空间因素以及在空间层面发生的语言间恒常、渐进的相互影响（直至融合）方面，仿佛是在补偿他给语音规律造成的伤害（试比较其著作：《论语音规律》，1885；《论罗曼语方言分类》，1900；《语言的融合问题》等）。И. А.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表达过相近的思想。很快，语音规律不容置疑的主张，简单化描写单一语言或亲属语言发展图式、“过渡”现象原因和形式的做法遭到反对，这不同程度地在历史比较语言学最繁荣的领域，首先在**罗曼语言学**，稍后又在**日耳曼语言学**中表现出来。这种反对立场尤其与尝试编制**方言地图集**（还有专门的词汇地理学）的工作以及语言地理学领域（J. 吉耶龙、稍后的F. 弗雷德、G. 温克尔、K. 雅贝格等）相关，**语言地理学**展现了难以言喻的更为复杂的语音（甚至语言）变化图景（其中包括展现语音规律在单个词方面渐渐发挥的作用，这种作用由于那些带有语音创新现象的词在语言空间扩展的速度不同而增加了新的复杂程度。语言变化由空间决定的思想（或者至少是这个方面的重要性）逐渐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中得到反映，试比较：梅耶的印欧语方言研究，这一研究后来在W. 波尔齐格、H. 克拉赫和意大利“空间”（地域）语言学代表M. G. 巴尔托利、G. 邦凡特、V. 皮扎尼、G. 德沃托等有关印欧语划分的著作中得到继续，意大利“空间”语言学代表者的兴趣是对地域作性质区分（核心地域、相邻地域、边缘地域）、确定创新现象中心及其传播途径和分析被历史比较语言学忽略的词层（如“文化”词，或称“漂泊”词）以及亲属语言和非亲属语言内部的语言联系。最后，20世纪20—30年代，提出了语言联盟理论（试比较：H. C. 特鲁别茨科伊、P. O. 雅可布逊、K. 桑菲尔德等人的著作；参见**语言联盟**），该理论确定了地缘促成的“次生”亲属

关系这样一种相互关系类型，这种亲属关系首先表现在形成各个相似的语言类型上，其次表现在建立一种语际过渡（在语言联盟之内）的换算系统上。关注语言的空间角度实质性地提高了历史比较语言学问题的研究深度；包括使研究者在很多方面重新审视原始语及其方言切分（试比较方言连续统概念）、稳定（“保守”）地带和创新地带划分、同言线方法和会聚过程的作用（参见**会聚**[конвергенция]；迄今历史比较语言学占统治地位的态度是**分化**[дивергенция]起主要的，甚至独一无二的作用）。

历史比较语言学，首先是历史比较语法学理论与实践的迅猛发展，使得历史比较语言学在 19 世纪中叶就已不仅被视为最发达、最精确的（有赖于高度形式化水平）历史（和比较）系列人文学科，还成为以历史主义和历史比较法原则为基础的许多其他学科的样板。在历史比较语言学和语言学的历史比较法成就的影响之下，19 世纪下半叶欧洲学界形成了比较神话学、比较法学、比较文学这样一些方向。尽管这些学科很快地取得了成绩，但都没可能达到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相媲美的地位：其中一些学科的可信度取决于所依据的语言数据（如比较神话学首先源于各种亲属语言中的神祇名称），另一些学科用其历史发展的形式分类更换历史比较法（比较文学）。尽管如此，历史比较语言学继续在总体思想、研究方式和方法、概念系统的结构、结果的呈现形式等方面，对这些学科领域施加影响。历史比较语言学对语言学其他学科产生的影响更加卓有成效和意义深远，包括描写（共时）语法学、类型学和理论语言学。这方面影响的最重要例证是：1）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的迅速建立及实践成就的取得造成一种态势，在这种态势之下，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后续发展寻求建立新的方法和研究角度；原本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内部情景角度来加以解释的系统概念、**共时**和**历时**区分等成为描写语言学或理论语言学的对象；2）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因果历史联系研究对共时状态下语言成分依存关系的研究兴趣产生了影响，以至最终导致**语言系统**概念的形成；3）语言历史发展中的**共相**（универсалии）和“频率共相”（фреквенталии, frequency universals）的研究成为构建语言类型学原则的重要动因之一；4）对于类推或者同源的**语言成分**的“历史主义”和“比较”的思想影响了语言的共时研究和类型学。尽管这些思想通常是以隐性的形式出现，但在构建语言研究新的（“非历史的”）方面中，它们发挥的作用仍然是毋庸置疑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从自身的角度而言，是乐意吸纳那些来自相邻语言学学科的推动因素的。反过来，对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影响的例证是：区分语言的共时和历时方面（由此而产生的将语言史构建为相互联系的共时断面总和的各种尝试）；引入系统概念（由此而定位于组建和分析成分系统或哪怕次系统，以克服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琐碎经验主义。历史比较语言学采用的内部构拟法同样以语言的系统观和系统内部各成分相互依存为前提：根据系统已知残迹重建其他成分甚至建起整个系统；引入与系统相关的其他概念：系统压力、“空格”（cases vides）、连锁反应、对立、有标记/无标记成分等（试比较 20 世纪 20—30 年代及稍后时期特鲁别茨科伊、雅可布逊、N. 范维克、A. 马丁内等在“因果—目的”研究中对这些概念的超乎寻常的使用频率；接受音位学思想（音位和音素的区分、区别特征、强音位和弱音位、中和、音位变化分布等）；顾及语言类型学发展成果（类型图式，特别是作为构拟的可接受性、可靠性、可证明性标准的共相）；采用**转换法**和生成语法思想（参见**生成语言学**：试比较历史比较语言学中的生成模式和更广泛一些的模式法的尝试）；关注统计（数量）法（亲属关系评价的量化方式、词汇统计法等，后者旨在不仅解释基础语解体和个别语言产生的绝对年代，而且确定对特定语言可能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年代界限）。引入**结构语言学**和数学（参见**数理语言学**）的方法，以决定历史比较语言学未来数十年的重要特性，并对一系列具体成就加以解释。

尽管严格区分共时和历时的结果使得许多领域被排除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特殊管辖范围之外，但历史比较语言学仍然是现代语言学最具代表性的领域之一，它在很多情况下将一些新的语言研究领域纳入自己的范围；涵盖诸如历史比较语法学（和语音学）、词源学、历

史语法学、比较词汇学和历史词汇学、语言构拟和历史发展理论、未知文字破解、古代文献学（所谓的古语言学）、标准语史；方言学、地名学、专名学等这样一些学科。上述中的一些学科（古语言学、原始语学说、方言学、词源学、地名学、专名学）对历史科学系列（考古学、史前史、历史民族学、神话学、宗教学、文化史、科学史前史、语言创作远古形式研究、历史比较诗学、文本结构研究等）得出研究结论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学科对许多自然科学领域也有影响，特别是在内容涉及到古代事实时（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地理学等），试比较像“语言植物学”这样的一些暂时还只是可能的要使用起来的观念。

历史比较语言学最可靠的基础是各别语言以及各别整体语言组群的历史语法、语系和语族的历史比较语法、词源词典和历史词典。所有这些领域都跻身迅猛发展的行列。研究得最为充分的领域应当是印欧、芬兰—乌戈尔、阿尔泰、闪米特、达罗毗荼、班图、印第安诸语言的历史比较语法。历史比较性质的严谨研究是以含米特、卡特维尔、纳赫—达吉斯坦、阿布哈兹—阿迪格、叶尼塞、萨莫迪、汉藏等诸语言为语料进行的。

那些在亲属关系上被认为是孤立的语言越来越引起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成绩也很显著。历史比较语言学中特别具有前景的领域，应是大语系之间对应成分的研究和亲属超语系的确定。尽管此前并不缺少对大语系进行比较研究的尝试（尤其是乌拉尔—阿尔泰、印欧—闪米特等大语系），但毋庸置疑，这一领域的新阶段起步于 В. М. 伊利奇—斯维蒂奇（因作者去世未能完成）及其继承者们在所谓诺斯特拉诸语言历史比较语法方面进行的奠基性工作。文本构拟的理论与实践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另一成就。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以更加深入和广泛的材料和结论，使历史比较语言学回到初始基础，“历史主义”原则和语言与文化关联原则。

Дельбрюк Б., Введение в изучение языка, в кн.: Булич С.,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СПб., 1904.

Сепир Э., Язык. Введение в изучение речи, пер. с англ., М.—Л., 1934.

Томсен В., История языковедения до конца XIX в., пер. с дат., М., 1938.

Мейе А., Введение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зучение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языков. 3 изд., пер. с франц., М.—Л., 1938.

его же,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метод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языкознании, пер. с франц., М., 1954.

Шухардт Г.,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по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пер. с нем., М., 1950.

Иванов В. В., Генеалогическая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языков и понятие языкового родства, М., 1954.

Десницкая А. В., Вопросы изучения родства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языков, М.—Л., 1955.

Вопросы методик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изучения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языков, М., 1956.

Пизани В., Этимология. История — проблемы — метод, пер. с итал., М., 1956.

Пауль Г., Принципы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а, пер. с нем., М., 1960.

Мартине А., Принцип экономии в фонетических изменениях, пер. с франц., М., 1960.

Иллич-Свитыч В. М., Опыт сравнения ностратических языков, т. 1—3, М., 1971—84.

Гердер И. Г., Идеи к философии истори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пер. с нем., М., 1977.

Соссюр Ф. де, Труды по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пер. с франц., М., 1977.

Семереньи О., Введение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пер. с нем., М., 1980.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изучение языков разных семей.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и проблемы, М., 1981.

Гумбольдт В. фон,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пер. с нем., М., 1984.

Гамкрелидзе Т. В., Иванов Вяч. Вс.,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й язык и индоевропейцы.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и историко-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праязыка и протокультуры, кн. 1—2, Тбилиси, 1984.

Whitney W. D., Language and the study of language, N. Y., 1867.

- еро же, The life and growth of language, N. Y., 1875.
- еро же, Whitney on language. Selected writings, Camb. (Mass.), 1971.
- Schleicher A. Compendium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4 Aufl., Weimar, 1876.
- Osthoff H., Brugmann K., Morph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auf dem Gebiete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I, Leipzig, 1878.
- Humboldt W., Ü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 und ihren Einfluss auf die Menschengeschlechts, Bd. 1—2. B., 1880.
- Jespersen O., Progress in language, 2 ed., L.—N. Y., 1909.
- Trubezkoy N. S., Gedanken über das Indogermanenproblem, «Acta linguistica», 1939, v. 1.
- Meillet A., Linguistique historique et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 1948.
- Lehmann W. Ph., Historical linguistics, N. Y., 1962.
- Pedersen H., The discovery of language. Linguistic science in the 19th century, Bloomington, 1962.
- Hoenigswald H., Language change and 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 Chicago, 1966.
- Arens H., Sprachwissenschaft. Der Gang ihrer Entwicklung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2 Aufl., Freiburg, 1969.
- Mounin G., Histoire de la linguistique, dès origines au XX-e siècle, 2 éd., P., 1970.
- см. также литературу при статье Индоевропеистика.

(张家骅、许高渝 审校)

塔马齐格特语 (Тамазигхт)

(作者: А. Ю. 米里塔廖夫 [А. Ю. Милитарёв]; 译者: 杨杰, 厦门大学)

又称塔贝尔布里特语、“柏拉柏尔”语 (Табербрит, «Бераберский» язык), 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之一 (属北阿特拉斯次语支)。通行于摩洛哥中部。使用该语言的人口 190 多万。塔马齐格特语系多种方言 (艾特伊兹杰格、扎扬、贝尼姆吉尔德等方言) 的汇集。

辅音系统的特点是塞音擦音化, 软颚音 g 和 k 硬颚化和塞擦音化 (伊扎伊安等方言), 有圆唇软颚音 k^w 和 g^w。元音音位有 a, i, u, ə。无名词有定范畴。“否定”完成体形式规定性地构成; 否定语气词由两个成素构成。状态动词的特殊变位法没有保留下来。关系形式无词形变化。很多方言中有虚拟式。大量的动词体貌语气词与强化、非强化未完成体动词形式搭配使用。语气词 d 是各种类型名词句的标志。主要的词序是 VSO。塔马齐格特语是日常交际语言, 而在其他领域则被阿拉伯语所取代。词汇中有很多阿拉伯语借词; 使用阿拉伯文字 (范围有限)。

Loubignac V., Étude sur le dialecte berbère des Zaïan et Aït Sgougou, P., 1924.

Mercier H., Vocabulaire et textes berbères dans le dialecte des Aït Izdeg, Rabat, [1937].

Laoust E., Cours de berbère marocain (dialecte du Maroc central), 3 éd., Rabat, 1939.

Penchoen T., Tamazight of the Ayt Ndhir, Los Ang., 1973.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塔舍尔希特语 (Ташельхит)

(作者: А. Ю. 阿依汉瓦尔德 [А. Ю. Айхенвальд]; 译者: 杨杰, 厦门大学)

又称塔舍利海特语、希尔哈语、什勒赫语、施卢赫语, 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之一 (属北支的阿特拉斯次分支)。通行于摩洛哥西南部和南部。使用该语言的人口约 240 万人。塔舍尔希特语系多种方言的汇集。

辅音系统的特点是塞音擦音化趋势较北方语支的其他语言欠明显, 有多个圆唇软颚音,

非叠辅音 g 的硬顎化和塞擦音化，非叠辅音 k 的擦音化。元音音位有 a, i, u 三个。允许辅音连缀。名词无有定范畴，状态动词不特殊变位。动词关系形式有数的变化，将来时由语气词 rad 与未完成体的各种形式组合表示；语气词 ad 和未完成体各种形式搭配表示虚拟式，这与其他柏柏尔—利比亚语言有所区别。语气词 d 是所有类型名词句的共同标志，句子主要词序是 VSO。广泛使用借自阿拉伯语的主从连接词。词汇中有大量阿拉伯语借词，也有来自罗曼诸语言的借词。塔舍尔希特语没有文字。

Stumme H., Handbuch des Schilhischen von Tazerwalt, Lpz., 1899.

Applegate J. R., An outline of the structure of Shilha, N. Y., 1958.

Destaing E., Vocabulaire français-berbère, P., 1920.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西闪米特文字（Западносемитское письмо）

（作者：И. М. 季亚科诺夫[И. М. Дьяконов]；译者：吴丽坤，黑龙江大学）

西闪米特文字是仅由表示“辅音+自由元音或零位元音”的符号构成的准字母文字，自右向左书写。公元前约第二千年上半叶至中叶时期发明于东地中海地区，最初为西闪米特诸语言所使用。西闪米特文字是世界上很多字母文字的祖先。假想的共同原型文字尚未发现。最古老的已知西闪米特文字变体有四种类型，符号的外形和写法特点彼此有别，但内部结构吻合：

1) 西奈半岛—巴勒斯坦文字是半斜体符号系统，其轮廓变化因时间、地点和书写者个人特点不同而十分显著。符号的局部与图画（眼睛、鱼、蛇、头）有些许相似。虽然在有些情况下，与图形相似的推测是不贴切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把西奈半岛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联结在一起的愿望使然，仿佛后者是前者的原型一样。尽管人们的书写各不相同，但就整体而言，排除符号变体，这个系统估计有 22—24 个符号。所有铭文都是简短的粗刻，几乎没有一则铭文是完整保留下来的；能够（没有十分把握）读出来的只是一些孤立的词。文字的时代不详（公元前第二千年上半叶至公元前第二千年中叶？）。(约公元前 1200 年)在伊兹贝特—萨尔塔赫（巴勒斯坦南部）发现的最后的斜体字母，无论在符号形体还是排序上，都与腓尼基字母几乎一致，很可能是腓尼基字母的变体。

2) 迦南文字或腓尼基文字是线性文字，由 22 个区别明显的符号组成。其字母排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二千年前。很多符号与比布鲁斯准象形文字相似（参见比布鲁斯（Byblos）文字）。大部分符号与西奈半岛—巴勒斯坦文字的符号在形体上，而且似乎也在意义上相吻合。得以保存下来的是刻在石头和金属上的铭文；最古老的铭文是在比布鲁斯（腓尼基，现今黎巴嫩的朱拜勒）发现的。其年代有争议，更可能的是公元前第二千年下半叶至公元前第二千年后期。塞浦路斯、奇里乞亚、撒丁和北非等地区的铭文属于较晚的时间。

3) 乌加里特文字是线性楔形文字。技术上与苏美尔—阿卡德楔形文字相似。但是两者在内部结构和轮廓上，从发生学角度看均没有联系。

4) 阿拉伯（半岛）文字是线性文字；由 28—29 个区分明显的符号组成；字母排序未完全知晓，但被南阿拉伯（半岛）文字的延续——埃塞俄比亚文字保存了下来。诸阿拉伯（半岛）字母系统可以划分为两组：a) 公元前 7 世纪甚至更早时期古阿拉伯语使用的字母系统；极古老的是历夏尼特文字，早些时候的是萨穆德文字和萨法伊特文字。符号是线性的，文本大多为粗刻；b) 一些南阿拉伯半岛古语言——萨巴语、密尼安语、卡塔班语和哈德拉马乌特语（现今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使用的字母系统。古文献涉及行政、献词和立法方面的内容，雕刻在石头和金属上。保留下来的最古老铭文不早于公元前第三世纪，但是因为萨巴国（又称萨瓦国）较之早 400 年前左右就已经存在，所以文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二千年。几乎一半字母 [ʔ, b, g, z, t, l, m(?), n, ʿ, s(?), q, š, t] 出自与腓尼基字母共同的

原型。最初的南部原始字母包含 24 个符号，也就是腓尼基文字中的 22 个符号再加上表示 **t** 和 **q** 的符号。与腓尼基字母系统不相似的字母中，有一些看样子与西奈半岛—巴勒斯坦字母风格十分相似，而其他字母或者已经变得难以识别，或者无论与腓尼基字母还是西奈半岛—巴勒斯坦字母，都没有什么共同的原型。尽管无法确信这些字母的意义也相似（除了南闪米特语的 **t** 与比布鲁斯准象形文字中的 **ta** 相符），但是其中的许多字母（包括腓尼基字母）在比布鲁斯准象形文字中都有相似的符号。

埃塞俄比亚领土上最古老的阿克苏姆王国起初曾使用南阿拉伯（半岛）语（萨巴语）及其文字，自 4 世纪起该文字顺从了本地吉兹语（通过基本符号形式的变体表达元音）。

对于重构西闪米特字母系统，十分重要的是小亚细亚和希腊各民族对准西闪米特字母系统的借用情况。希腊字母系统（及弗里吉亚字母系统）源于腓尼基字母系统的事实早已被古希腊学者所确认，从未遭到过质疑；借用腓尼基字母系统（似借自腓尼基字母系统的南方变体——提尔、雅法变体）的时期应在公元前 8 世纪，最早公元前 9 世纪（参见**希腊文字**）。

古小亚细亚诸字母系统（吕底亚、利基亚、卡利亚等字母系统）起初没有与西闪米特文字产生历史的问题联系起来，因为保存下来的文献年代颇晚（不早于公元前 6 世纪至公元前 4 世纪）。但是可以推断，曾经有过更早时期的古文献，但是未能保存到今天。比如（小亚细亚西部出土的）“类吕底亚”铭文似表明，后来的吕底亚文字，在组成和数量与腓尼基文字已很接近的初始字母系统中补充了一些符号。但是很多字母的形体既不同于希腊字母，又不同于我们熟悉的腓尼基字母。可能吕底亚的 **8** (**f**) 和共同西小亚细亚的 **↑w** (**t'**, **ts**) 都起源于字母 **w**, **t** 或者 **s** 的南闪米特形体，它们看来在若干南腓尼基字母系统或巴勒斯坦地方字母系统（后来过渡成为阿拉伯（半岛）字母系统）中，同西闪米特字母形体曾经有过竞争。

有关西闪米特文字的起源，遇到两个问题：符号形体的出现问题和文字系统内部结构的出现。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关注点几乎全部集中在第一个问题上。盛行的一类假说认为，西闪米特文字符号形体起源于埃及文字符号（或圣书体，或大众体；或直接源于埃及文字，或通过西奈半岛文字中介），与此同时，闪族人仿佛赋予了埃及符号以自己的读法。但这些假说均无法令人信服。

按照另一流行于 20 世纪中叶、并且在 80 年代仍有拥护者（A. Γ. 伦金）的假说，符号的形状是依据“字母象形称名原则”按照读音意思选配的，也就是说，符号的形体与字母传统名称的指物一致。但是这一假说同样没有说服力，因为：

1) 字母的名称产生在相应文字出现之后，甚至可能在字母顺序出现之后（乌加里特文字在公元前 14—公元前 13 世纪有与腓尼基文字大体一致的字母排序，但是字母的名称不同，是音节名称）；

2) 即便可以看出个别腓尼基字母和与其名称对应的物体相似，但其他字母不是这样；

3) 不存在任何另外一种情形：文字按照“字母象形称名原则”出现，而字母的表义名称却可能与字母形体没有任何联系地再度产生（试比较希腊人保留了腓尼基—巴勒斯坦的字母名称，但是斯拉夫人却给同样这些字母规定了自己的意义名称）。

可见，字母象形称名理论对于解释西闪米特文字外部形体产生的原因不能提供任何帮助。这些符号形体更可能是，在使用腓尼基人已熟悉的比布鲁斯准象形文字形体系统过程中随便想出来的（或许是通过挑选“辅音+a”型符号的途径，按照 I. J. 盖尔布的观点，这是每个符号的基本意义）。顺便指出，如果把字母的名称都翻译成公元前第二千年就应该常规具有的语音形式，那么任何情况下，在赋予字母的名称的第一个辅音后都有元音 **a**，如 ***a-lp-**、**ba-īt-**、***ga-ml-**、**da-lt-**，等等。

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有关西闪米特文字内部形式起源的问题。公元前第二千年中叶近东地区存在 3 种类型的单词—音节文字和音节文字：1) 阿卡德语类型，以单个符号表示

不同元音和辅音构成的开音节和闭音节；2) 爱琴海诸语言类型（如克里特—迈锡尼、卢维和比布鲁斯准象形文字），单个符号只表示开音节；3) 埃及语类型，单个符号只表示带有自由或者零位元音的音节；在特定位置上，单辅音符号可以表示“辅音+零位元音”。如果说比布鲁斯准象形文字属于第二种类型（按盖尔布说），那么西闪米特文字则应属于第三种类型，很明显，其内部结构（而非其符号形体）的思想来自于埃及文字。因此，在公元前第二千年末叶至公元前第一千年初叶形成了3种由22—28个符号组成的有亲缘关系的线性文字系统；每一个符号都表示“辅音+自由或零位元音”。这样的文字被称为准字母文字或辅音文字，是音节文字的变体。它们甚至对辅音音位系统也不必一对一地表达。如腓尼基—迦南文字中一个符号对应两个音位 /s/ 和 /s/, /h/ 和 /h/, /ʕ/ 和 /y/；或许可以推断，其他情况下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一个重要的改进举措是采用所谓的兼元音字母（*матрес лекционис*），即用辅音字母 *ʾ, h, w, j* 兼表元音 /ā/, /ū/, /ō/, /ī/, /ē/。虽然在公元前9—公元前8世纪这种方法已常用，但毕竟是随意性质的；直至希腊文字（源于腓尼基文字）才给元音全部规定了必需的符号。

由辅音字母 *b, d, g, h, w, z, h, t, j, k, l, m, n, s, ʕ, p, ʃ, q, r, š, t* 和兼元音字母 *ʾ, h, w, j* 构成的腓尼基—迦南准字母系统，除了曾用于腓尼基语以及其时期晚得许多的变体布匿语，还用于其他所有西闪米特语（其存在期间一直使用），其变体形式至今仍然用于现代希伯来语、以色列人的其他一些口语语言以及现代亚述语（新叙利亚语）。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符号的外部形体逐渐变得难以识别，因此现今将其区分为如下几种独立变体：

1) 纯腓尼基（及布匿）线性文字（5世纪前）。

2) 古阿拉米草写体文字（或许是纯腓尼基文字最初的草写体）；字母分写，没有**合体字母**，典型特点是不区分字母 *d* 和 *r*；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后亚述语及**古波斯语**办事机构的官方文字，西闪米特语大部分晚期阿拉米语变体的来源，也是各种伊朗语**非形音对应文字系统**（**帕提亚文字**、**中古伊朗文字**（中古波斯巴列维语（*Pahlavi*）文字——译者注）、**花拉子模文字**、**粟特文字**、以粟特文字为中介的**维吾尔文字**以及其他中亚地区文字）的来源。

3) 撒玛利亚文字，撒玛利亚教派用以书写犹太语和当地的阿拉米**方言**（至今仍在巴勒斯坦纳布卢斯市地区使用），该文字摹仿腓尼基文字的碑铭体风格。

4) 犹太“方格”文字，模仿古阿拉米草写体文字的风格。至少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犹太人就已经开始使用这种文字，并通过伊夫里特语和拉地诺语（*Ladino*）、**依地语**等犹太口语语言保留至今。8—10世纪对宗教文本详尽制定了一套超音位层面的行上、行下变音符号系统（*ā, a, ā, e, i, u, ō, ū, ǝ, ǝ, ǝ, ǝ*）。该文字曾经有并且现在依然保存着各种各样的草书形体，但是连写文字没有得到发展。旧约（圣经的一部分）、内容广泛的中世纪神学、哲学、文学作品都是用这种文字书写的。

5) 帕尔米拉文字，在许多方面与“方格”文字相似，是另一模仿古阿米尔草写体风格的文字；字母分写，以各字角卷曲为特点，直线有间断。仅在岩石（碑文、课税价目）和硬币等上面保留下来一些文字。公元第一千年上半叶，阿拉米人的帕尔米拉王国曾使用该文字。

6) 纳巴特伊文字，是古阿拉米文字风格巍峨的诸变体之一的延续；有大量合体字母。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在纳巴特伊王国（现今的约旦至西奈半岛）普遍使用（石头和硬币上的铭文）；是阿拉伯文字的起源。

7) **叙利亚文字**。

8) 巴勒斯坦—基督教文字，或许是古老的叙利亚埃斯特兰吉洛（*Estrangelo*）文字的久远延续，曾被中世纪早期巴勒斯坦和南叙利亚操阿拉米语的东正教徒使用。

9) 曼达文字，是半连写、有元音标记的辅音文字。由帕尔米拉或早期纳巴特伊文字类型的阿拉米书写形式发展而来，被操东阿拉米语方言的群体，即曼达教诺斯替教派信徒所使

用（为数不多的信徒保留在南伊拉克）。

10) 摩尼教字母系统（源于阿拉米文字），于公元 3 世纪因摩尼教而形成；宗教经卷用多种语言表述。

Дирингер Д., Алфавит, пер. с англ., М., 1963.

Тайны древних письмен. Сборник переводов, М., 1976.

Фридрих И., История письма, пер. с нем., М., 1979.

Гельб И. Е., Опыт изучения письма. (Основы грамматики), пер. с англ., М., 1982.

Лундин А. Г.,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алфавита, «Вестник древней истории», 1982, № 2.

Driver G. R., Semitic writing from pictograph to alphabet, L., 1976,

Garbini G., Sull'alfabetario di 'Izbet Sartah, «Oriens Antiquus», 1978, XVII.

Beeston A. F. L., South Arabian alphabetic letter order, «Raydān», Aden, 1979.

（张家骅、田文琪 审校）

泽纳加语（Зенага）

（作者：А. Ю. 阿依汉瓦尔德 [А. Ю. Айхенвальд]；译者：易绵竹，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又称伊兹纳根语，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之一（单列为该语族的西支），通行于毛里塔尼亚西南部，有人认为还可能通行于塞内加尔的东南部，使用人口约 2 万人。

泽纳加语音位系统的特点是：齿塞音擦音化，强势特征间或丧失，从 γ 向 $\emptyset$ 过渡（ $\gamma > ' > \emptyset$ ）， g 和 z 塞擦音化（ $g > \check{g}$, $z > dz$ ）， l 的硬顎化和塞擦音化（ $l > dj$ ）、 $\underline{u}$ 和 $\underline{uu}$ 处于元音后时变为 b , bb （ $\underline{u} > b$, $\underline{uu} > bb$ ），不同位置上清塞音和浊塞音交替，以及元音存在大量音位变体（аллофон）。泽纳加语词的面貌在语音和形态音位变化影响下，与其他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相比有所改变。

在词法领域，泽纳加语与其他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不同的是，其指小形式借助语气词（阳性为 ay ，阴性为 $\check{a}$ ）加后缀 $-it/-t$ 构成。分析形式的复数普遍使用。无名词状态范畴和“否定”完成体范畴。状态动词没有特殊变位形式。使役词基用前缀 $es-/et-$ 表示，反身词基用前缀 $m-/n-/mn-$ 表示，被动词基用前缀 $t/-\check{s}-$ 表示。语气词 $\emptyset d$ （共同柏柏尔—利比亚诸语相应的语气词为 d ）是名词句的标志。句中词序为 SVO。使用借自阿拉伯语的连接词作为从属连接词。词汇中有很多阿拉伯语借词。泽纳加语无文字。

Faidherbe G., Le Zénaga des tribus sénégalaises, P., 1877.

Nicolas F., La langue berbère de Mauritanie, Dakar, 1953.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泽内特诸语言（Зенетские языки）

（作者：А. Ю. 阿依汉瓦尔德 [А. Ю. Айхенвальд]；译者：李侠，黑龙江大学）

又称泽纳塔诸语言，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北支中的次语支。通行于摩洛哥东北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西北部。使用人口约 350 万人。

泽内特诸语言包括摩洛哥的塞格鲁欣语、里夫语、格马拉语、杰巴拉语、森哈贾语、伊兹纳森语、菲吉格语等；阿尔及利亚北部的泽卡拉语、斯努斯语、马特马塔语、哈拉瓦语、梅纳塞尔语、申瓦语、贝尼语、萨拉赫语、沙维亚语；阿尔及利亚中部绿洲地带奥兰省南部诸方言、古拉拉语、图亚特语、提迪凯勒特语、姆扎布语、瓦格拉语、里格赫语（或称图古尔特语——译者注）等；突尼斯的塞内德语、杰尔巴语、泽拉瓦语等；利比亚西北部的祖阿拉语，可能还有内富萨语。

元音音位有 a , i , u , $\emptyset$ ，一些方言中还包括 e 和 o 。辅音系统的特点是软顎塞音的硬顎化和进一步塞擦化 $g > g'$, $k > t\check{s}$ （ k 在一些方言中可发生擦音化）， $\underline{d}$ 和 $\underline{z}$ 有失去强势特征的倾

向，一些方言中齿塞音发生擦音化。形容词有不定范畴（标志为语气词 d）。状态动词不具有共同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的变位系统，关系形式没有性和数的变化。以 tu-为标志的被动词基（poroda）不如其他北支语言能产。

阿尔及利亚西北部、北部和摩洛哥东北部的泽内特诸语言的特点是有“否定”的加强未完成体形式；阿尔及利亚东部和突尼斯的泽内特诸语言以不借助接续状态（statyc）构成主语为特点。主要的词序为 VSO。词汇里有大量的源自阿拉伯语的借词，也有源自拉丁语和其他罗曼诸语言的借词。泽内特诸语言没有文字。

Basset R., Étude sur les dialectes berbères de la Zenatia du Mzab, de l'Ouargla et de l'Oued Righ, P., 1892.

Mercier G., Le chaouia de l'Aurès, P., 1896.

Destaing E., Étude sur le dialecte berbère des Beni-Snoûs, P., 1907—11.

Ergo же, Étude sur le dialecte berbère des Aït Seghrouchen, P., 1920.

Laoust E., Étude sur le dialecte berbère du Chenoua comparé avec ceux des Béni-Menacer et des Béni-Salah, P., 1912.

Biarnay S., Étude sur les dialectes berbères du Rif, P., 1917.

Basset A., Les parlers berbères, в кн.: Initiation à la Tunisie, P., 1950.

Huyghe G., Dictionnaire chaouia-arabe-kabyle-français, Alger, 1907.

Ibáñez E., Diccionario Rifeño-Español, Madrid, 1949.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指称（Референция）

（作者 Н. Д. 阿鲁秋诺娃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译者：李勤，上海外国语大学）

指称是实际使用（纳入言语）的名词、名词用语（名词短语）及其等值词语同现实客体（**指称事物**，**所指事物**）的联系。指称由三个基本因素决定：句法因素、逻辑语义因素和语用因素（参见**语用学**）。名词用语根据句法功能有指称用法和非指称用法之分：在**题元**（**主语**和**补语**）的位置上可以实现指称的各种类型，在**谓词**的位置上名词的使用是非指称的，不指向现实客体，而指向相应客体的特征：Петр — писатель（彼得是作家）。与逻辑语义因素相关的是名词短语同现实客体的下列类型联系：对某类事物一个个体的指称，对某类事物部分个体的指称，对有一定特征标记的子类事物的指称，对整个一类事物的指称，对某类事物任何一个（每一个、各个）个体代表的指称，不针对某类事物任何个体成员（对潜在客体）的指称。与语用因素相关的是根据交谈者双方知识域对指称类型的区分。可以谈及只有说话人知道的事物（**引进性指称**）：Есть у меня один приятель（我有一个朋友）；也可以谈及说话人和听话人皆知的事物（**证同指称**）：Этот ребенок никого не слушается（这个小孩谁的话也不听）；可以是交谈双方都不知道的事物（**不定指称**）：Петр женился на какой-то студентке（彼得和一个女大学生结婚了）。语用因素主要在具体指称范围里起作用，这时名词用语同固定事物、个体联系。具体指称依靠客体存在的**预设**。

参与指称实现的有自主单位及其指称标记词。属于自主单位的有**专有名词**、普通名词、名词词组（名词短语）、人称代词、不定代词、指示代词、**否定代词**。形成名词用语的指称标记词有**冠词**、物主**形容词**、指示形容词、不定形容词、否定形容词和**数词**。参与指称机制形成的是决定指称的名词用语的词汇意义、名词的定语和上下文，尤其是建立名词**同指**（指向同一个事物）的复指联系。

同一个指称类型原则上可以用各种语言手段表现。例如，在实现与语用因素有关的识别功能时，最常使用的有：1）实现直指（дейктический）功能的指示（和人称）代词，可用于取决于言语情景的任何事物；2）实现称名功能的专有名词，不受**交际**条件影响，具有个体指称的属性；3）由普通名词和指称标记词组成的名词性用语，名词实现指物功能（或称

说), 用于其意义为真时的任何客体, 指称标记词把指称范围从类别缩小到个体。这样, 识别指称依靠三种关系: 指示、称名和称物。选择识别事物的方式受到语用方面的制约。在事物存在于情景中时, 由指示关系实现指称。当事物为交谈双方所知时, 由称名关系实现指称。事物是说话人所知而不为受话人所知时, 由称物关系实现指称。

指称的类型决定名词用语的意思在语句语义中的作用。当指称通过指出客体隶属类别的关系实现时, 名词短语的意义是**语句**语义的组成部分, 例如: Из леса выбежал заяц (从森林里跑出来一只兔子); Лев — хищное животное (狮子是猛兽)。在这种情况下说话人使用的是有**分类学**意义的名词。在识别指称时, 说话人指出客体的个体特征, 使之从一类事物中区分出来, 例如: твой отец (你的父亲)、моя дача (我的别墅)、владелица этой дачи (这座别墅的女主人)、автор «Воскресения» (《复活》的作者)、убийца Кениди (杀害肯尼迪的凶手)、королева Англии (英国的女王)。这些用语通常称为“有定摹状词”(B. 罗素的术语)。K. 唐奈兰 (Keith Donnellan) 分出两种确定摹状词的用法: 指称用法和属性用法。在指称性用法中, 摹状词的意义仅限于指向客体, 不是语句的内容成分, 因而不影响其真值意义。用同一指称的用语来替换另一用语不会影响语句为真, 例如: Автор «Гамлета» (автор «Макбета») умер в один год с автором «Дон Кихота» (Сервантесом) (《哈姆雷特》的作者(《麦克白》的作者)和《堂吉珂德》的作者(塞万提斯)同一年去世)。这种用法称为“透明”用法。在属性用法中, 用语的意义是语句意思的成分, 在语义上与谓词相联系, 履行描写功能(与识别功能并列), 例如: Грабитель складов не новичок (仓库的偷窃者不是新手)。这种用法称为“不透明的”用法(W. O. 蒯因)。

指称理论发端于逻辑学, 源于对普通名词, 首先是对具体词汇的意义和使用的观察(G. S. 密尔、G. 弗雷格、罗素、P. 卡尔纳普等)。普通名词具有特定的概念内容(**概念意义**), 同时能指物(称物), 即具有外延。逻辑学家们在名词语义结构的双重属性中寻找逻辑悖论的原因, 尤其是偏离同一律的原因(弗雷格)。对名词语义结构上述成分过度划分导致逻辑语义学被分为意义理论和指称理论(蒯因)。指称理论主要关注识别这一类型,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指称的基本观点。指称理论逐渐语用化, 这影响了指称理论的总体发展趋势。指称理论的概念体系吸收了说话人的态度、意念、受话人的知识域、语句的交际组织、上下文关系等概念。L. 林斯基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 他把指称行为直接和说话主体联系起来, 对指称同那些指向言语对象语言用语的意义之间的联系提出了怀疑。指称这样一来就被解读成说话人意念的一种表现。J. R. 塞尔把指称行为理解为说话人意图和受话人了解这一意图之间的关系。后来, S. A. 克里普克建议区分说话人指称和语义指称。第一种指称受制于语境和言语作者的意图(属于语用学), 第二种指称受制于语言规约。

与指称的意念论(语用论)并存的还有语义论、称名论和直指论。它们的区分依据是, 在确定语言用语同特定现实客体之间的联系时, 哪种类型的关系被赋予最重要的意义。语义论(与之相近的还有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的依据是, 指称由意义实现, 这种主张甚至扩展到了专有名词。在许多情况下专有名词被视为隐形摹状词(“荷马”的名字隐含了摹状词“《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称名论(例如克里普克的因果理论)的依据是, 指称由称名关系实现, 这种主张扩大到一些类似专有名词的普通名词(表示自然现实和物质的名词), 它们被与专有名词等同起来。直指论(D. 卡普兰的观点)的依据是, 指称的实质在于对事物的直指, 把名词和客体联系起来的其他方法都可归结为这种机制。语义论把语言的描写手段绝对化了, 其弱点在于主张专有名词有意义。称名论把称名关系绝对化了, 其弱点在于错误地认为普通名词的意义不参与识别指称。指示论把指示关系绝对化了, 错误地否定指称用语的意义参与形成语句的意思。

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его смысл, М., 1976.

Петров В. В., Проблема указания в языке науки, Новосиб., 1977.

- Фреге Г., Смысл и денотат, «Семиотика и информатика», 1977, в. 8.
- Беллерт И., Об одном условии связности текста, в кн.: Новое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в. 8 — Лингвистика текста, М., 1978.
- Новое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в. 13 — Логика и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Проблемы референции), М., 1982.
- Шмелёв А. Д., О референции агентивных существительных,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1983, № 4.
- Языков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в аспекте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прагматики. Сборник обзоров, М., 1984.
- Падучева Е. В.,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и его соотнесённость с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ю, М., 1985.
-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языков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х системах, М., 1987.
- Референция и проблемы текст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М., 1988.
- Russell B., On denoting, в его кн.: Logic and knowledge, L., [1956].
- Kaplan D., Dthat, в кн.: Syntax and semantics, v. 9 — Pragmatics, N. Y. — S. F. — L., 1978.

(田文琪、张家骅 审校)